

魏裔介之文學活動與文學思想析論

王 兵^{*}

摘 要

魏裔介（1616-1686）為清初理學名臣，關於他的文學活動與文學思想，長期以來學術界鮮有關注。實際上，魏裔介在文學活動方面，不僅勤勉為文，喜好弄筆，編選刊刻多種詩文選本，而且與諸階層文人均有詩文唱酬，往來頻密。另外，自身詩文創作亦能做到發抒性情，風格醇雅。在文學思想方面，他不僅在「道主文從」的前提下肯定了文學的獨立性，在融合「性情之正」和「性情之真」的基礎上倡導「真詩」，還對文學與時代的關係、創作主體的素質以及作文閱詩之法等問題進行了具體深入的思考。結合魏裔介其時位高權重的社會地位和在清初文壇中的社會影響，本文認為，魏裔介的文學成就既反映了明末清初文風的轉變，又帶有明顯地為盛世文風樹立典範的功利色彩。

關鍵詞：魏裔介、文學活動、文學思想、性情、清初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國立教育學院中文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魏裔介（1616-1686），字石生，號貞庵，又號昆林，明末直隸柏鄉（今河北省邢臺市柏鄉縣）人，清初理學名臣。順治三年（1646）考中進士，成為滿清入關後以科舉錄用的首批漢官之一，¹歷任工科給事中、吏科右給事中、兵科都給事中、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左都御史、吏部尚書、內秘書院大學士等職。康熙十年（1671）辭官回鄉，次年加太子太傅。其為官二十餘載，直言敢諫，諳練政事，舉凡政治制度、軍事經濟、民生疾苦、倫理教化諸方面皆有建樹。雖然在入仕期間也遭受了一些挫折，²但總體而言，魏裔介在清初政壇的影響力非同一般，對清初順治、康熙二朝的政治穩定、禮制確立以及吏制建設等做出了積極貢獻。

魏裔介不僅是一位出仕清廷的名臣，還是清初著名的學者。崇尚程朱理學，以性善為宗，反佛、法入儒，並強調踐履聖學，與魏象樞（1617-1687）、湯斌（1627-1687）、陸隴其（1630-1692）、熊賜履（1635-1709）、李光地（1642-1718）等同屬清初理學名臣。長期以來，學界對於魏裔介的研究多集中於他的政治功績和理學思想，散見於清初以降諸種傳記、筆記、方志文獻以及今人之學術論文。³相較而言，對其文學活

¹ 關於明末舉人魏裔介出仕清廷的原因，陳潔儀：《魏裔介：明末士人仕清個案研究》中單拈一章探討，主要觀點有三：首先，魏裔介早有用世的取向，他如傳統的知識分子，希望透過科舉考試晉升仕途。另外，明末吏治敗壞，民不聊生，明朝的傾頹已到無可挽救的地步。再者，清廷能夠因時制宜，並以功名厚祿籠絡明朝諸臣及士人。（見香港大學碩士論文，2005，頁46-51。）此外，王政堯：〈論清代名臣魏裔介〉一文對此亦有闡述，觀點與陳文相仿。（見《故宮博物院院刊》，1990年第4期，頁83-88。）另據陳永明：〈降清明臣與清初輿論〉可知，那些在改善民生、恢復社會秩序，以及維護華夏文化於不墜等幾方面有實績的清初明降臣，清初輿論對他們都採取了較為寬容的態度。（見《漢學研究》第27卷第4期，頁197。）因此，在明末並未出仕的魏裔介參加清初首次科考，不能徑言其大節有虧。

² 魏裔介的仕途生涯，曾經遭受三次較大的挫折，分別是順治十四年（1657）的奏請更定職官世襲制度事件、順治十七年（1660）的劾奏劉正宗、成克鞏事件以及康熙九年（1670）的反遭御史李之芳彈劾事件。詳情可參見〔清〕魏裔介著，魏連科點校：〈前言〉，《兼濟堂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10-11。

³ 關於魏裔介的已有研究，傳記資料類主要有徐乾學（1631-1694）〈光祿大夫太子太傅禮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加一級柏鄉魏公裔介墓誌銘〉、任啟運（1670-1744）〈太子太傅保和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魏公傳〉，以及錢林（1762-1828）《文獻徵存錄》、吳修（1765-1827）《昭代名人尺牘小傳》、梁章鉅（1775-1849）《國朝臣工言行記》、唐鑑（1778-1861）《國朝學案小識》、張維屏（1780-1859）《國朝詩人徵略初編》、李元度（1821-1887）《清朝先正事略》、王炳燮（1822-1879）《國朝名臣言行錄》、李桓（1827-1891）《國朝耆獻類徵初編》、趙爾巽（1844-1927）等《清史稿》、徐世昌（1858-1937）《大清畿輔先哲傳》、《清儒學案》、姚永樸（1861-1939）《舊聞隨筆》、李玉棻（1865-1897）《歐鉢羅室書畫過目考》、李放（1883?-?）《皇清書史》、王晔（1846-1910）《今世說》、朱汝珍（1870-1943）《詞林輯略》、鄧之誠（1887-1960）《清詩紀事初編》、蔡冠洛（1890-1955）《清代七百名人傳》、國史館《滿漢名臣傳》、《漢名臣傳》、嚴文郁（1904-2005）《清儒傳略》等史料文獻中均有魏裔介的相關記載；此外，筆記類著作昭槁（1780-1833）之《嘯亭

動和文學思想的研究則寥寥無幾。⁴ 1979 年，臺灣學者葉慶炳、吳宏一所輯《清代文學批評資料彙編》，首次將魏裔介十一篇序文納入文學批評史的研究視域。⁵ 雖僅為輯錄，但創始之功無容置疑。反觀中國大陸學界的諸種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史著作，對於清初理學家如魏裔介等人的文學成就或付諸闕如，避而不談，完全被遺民作家、「江左三大家」以及「國初六家」的光芒所遮蔽；或僅在闡述清初學術文化背景時偶有提及，且是關於他們的理學思想對於清初文壇的影響，並未涉及其文學思想。⁶ 這顯然與客觀實際不符，《四庫全書總目》評價魏氏文學成就云：「詩文醇雅，亦不失為儒者之言。雖不以詞章名一世，而以介於國初作者之間，固無忝焉。」⁷ 吳偉業（1609-1672）亦稱：「公

續錄》和方志類文獻《柏鄉縣志》亦有魏裔介的相關介紹。今人的研究成果依時間順序為：王雲五：〈魏裔介的政治思想〉（見氏著《清代政治思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頁 145-146）、王政堯〈論清代名臣魏裔介〉、李建麗等〈魏裔介及其家族墓志綜考〉（見《文物春秋》，1996 年第 4 期，頁 36-49）、黃色芬〈華北仕清漢官與明遺民的出處〉（見臺北：國立師範大學碩士論文，1997）、王秀彥〈清初名臣魏裔介〉（見《邢臺師範高專學報》，2000 年第 1 期，頁 49-50）、潘志鋒〈魏裔介的道統論〉（見《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 年第 3 期，頁 101-103）、劉水雲〈魏裔介〉（見《溫州師範學院學報》，2003 年第 6 期，頁 35）、陳潔儀〈魏裔介：明末士人仕清個案研究〉、黃一農〈魏裔介與天主教〉（見氏著《兩頭蛇：明末清初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 140-142）、楊菁〈心統與治統的建構〉（見氏著《清初理學思想研究》，臺北：里仁書局，2008，頁 49-103）、王勝軍〈論魏裔介的復性之學〉（見《貴州社會科學》，2009 年第 7 期，頁 128-132）、齊仁達〈魏裔介生平與著作研究〉（見復旦大學碩士論文，2010）、高進〈《清史列傳·魏裔介》辨誤四則〉（見《歷史檔案》，2011 年第 1 期，頁 104-105）等；西文研究文獻則有：1) Fang Chao-ying, "Wei I-chieh," in Arthur W. Hummel (1884-1975) (ed.),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44) (hereafter ECCP), vol.2, pp. 847-848. 2) Lynn A. Stuve, "Ruling From the Sedan Chair: Wei Yijie (1616-1686) and the Examination Reform of the 'Obol' Regency," *Late Imperial China*, vol. 25, no. 2 (December 2004), pp. 1-32. 前者為傳記資料，後者主要分析魏裔介對清初考試制度的影響。新近出版的兩部關於魏裔介的歷史小說——魏國靜、高玉昆著《大清國相魏裔介》（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0）和魏重陽著《名相春秋：清初重臣魏裔介》（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11）則不能算嚴格的學術專著。

⁴ 除卻鄧漢儀《詩觀》、查為仁《蓮坡詩話》、徐世昌《晚晴簃詩匯詩話》等文獻中提及魏裔介之文學創作和文學思想外，今人學術論文僅有張壇茹的兩篇文章——〈清初名臣魏裔介的為詩之道〉（見《青年文學家》，2010 年第 1 期，頁 11）和《魏裔介散文研究》（見河北大學碩士論文，2010）。

⁵ 參見葉慶炳、吳宏一編：《清代文學批評資料彙編》上冊，（中國文學批評資料彙編之八）（臺北：成文出版社，1979）頁 107-116。

⁶ 如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第四卷）專論「文化專制下的學術與文學」一節提到：他（康熙帝）還任用了一批信奉宋代程朱理學的官員，如魏裔介、熊賜履、湯斌等所謂「理學名臣」，編纂理學圖書，升朱熹為孔廟大成殿配享十哲之次，成為第十一哲。宋代理學遂成為清代的官方哲學。（參見袁行霈編《中國文學史》第四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第 2 版，頁 198。）他如王運熙、顧易生主編《中國文學批評通史》七卷本，雖在其《宋金元卷》中單列一節「理學家的文學觀」，但是《清代卷》對於理學家之文論則未曾提及。此外，嚴迪昌著《清詩史》、張健著《清代詩學研究》等對魏裔介之文學創作和思想均未置一詞。倒是陳友琴選註《元明清詩一百首》中選錄了魏氏一首〈送宮紫玄歸廣陵〉詩，並加以註評。（參見陳友琴編：《元明清詩一百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頁 97。）

⁷ [清]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0），卷一七三，頁 1521。

秉鴻俊魁傑之才，……所謂理學、文章、政事，三者殆兼而有之。」⁸ 江陰後學曹禾（1637-1699）評價魏氏功績時云：「先生之文章，當代仰為師表，衣被沾丐，單詞片紙，頃刻傳播。」⁹ 曹氏此言雖有誇飾之處，但也並非捕風捉影。作為理學名臣群體的傑出代表，魏裔介的詩文創作和文學思想理應在清初文壇佔有一席之地。職是之故，本文將從文學活動和文學思想兩個視角來論證清初理學名臣魏裔介的文學成就，進而探析其文學成就對於清初文壇的影響。

二、魏裔介的文學活動

宋明以降，理學家多將「文」視為「道德之餘，事功之末」¹⁰，魏裔介自然未能免俗。不過對於那些名儒而言，關於文學功用的評估和其真正的文學實踐之間往往並不能劃上等號。¹¹ 縱觀魏裔介的著述，經史子集皆有涉獵，詩文創作亦頗有特色，非一般高談性命、束書不觀之理學家可比。析言之，魏裔介的文學活動主要涵括文學作品的結集編刻、與其時文士的詩文交往以及自身的文學創作三個方面。

（一）文學作品的結集、編刻

這裡所謂文學作品的結集編刻涵括兩層意旨：一是指他人作品的選編和刊刻，二是指魏氏自己創作的文學作品的結集和編刻。魏裔介在政事之餘及里居期間，不僅自身「好弄筆」，還十分喜好編選、批點和刊刻前賢作品或當代佳作，或觀風俗，或彰風雅。觀魏氏《兼濟堂文集》，尚存有所輯《唐詩清覽集》、《古文欣賞集》、《左國欣賞集》、《兩漢欣賞集》、《唐文欣賞集》、《古文分體大觀》、《宋文康公、王文安公選詩合刻》、《今文溯洄集》等書之自序文，復有《觀始集》和《今詩溯洄集》行世。此外，魏氏對於編刻、評點他人作品的熱衷，還可以在其子魏荔彤（1670-?）編輯的《魏貞庵先生年譜》中得到印證和補充：

庚辰（1640），公二十五歲：手批真西山《文章正宗》、《陶淵明集》暨

⁸ [清] 吳偉業：〈原刻兼濟堂文集序〉，見[清] 魏裔介著、魏連科點校《兼濟堂文集》，同註 2，頁 1-2。

⁹ [清] 曹禾：〈原刻兼濟堂文集序〉，同前註，頁 6。

¹⁰ 同前註。

¹¹ 南宋朱熹（1130-1200）便是顯證，他既是南宋理學之集大成者，同時亦為其時詩文大家。

《國朝憲章類編》。¹²

辛卯（1651），公三十六歲：捐資刻拙庵公所選《李、杜、王、蘇四家詩》，公詳為考訂，冬十二月服闋。¹³

丙申（1656），公四十一歲：此時海內漸平，風雅颺起，公與鉅鹿楊猶龍、永年申鳧盟、內邱喬文衣、太倉吳梅村、合肥龔鼎孳唱和。四方詩人多酬答之，公於是有《觀始集》之選。¹⁴

戊戌（1658）：公四十三歲：時海內文教日盛，崇尚風雅，公於是有《唐詩清覽集》之選。¹⁵

辛亥（1671），公五十六歲：是冬，公閱宋人陸務觀詩集，八十五卷，仍選定，令人抄成一集。蓋務觀詩識見超踔，風味雋永，與眾迥然不同，故公晚而好之。¹⁶

乙卯（1675），公六十歲：是年公以歷代古文無善本，選定本題曰《欣賞集》。自《左》、《國》迄元、明，皆有序文冠其首，而其總敘云：「歷代古文者，天地之符瑞，人生之菁華也。……」¹⁷

由上可見，魏裔介自入仕前直至晚年都篤好詩文，尤喜親操選政，對文學經典的選擇也較為通達。具體而言，詩歌方面，唐宋名家兼取；古文方面，歷代精華悉收。下面擇要介紹一下存世的兩部詩歌選本：

《觀始集》十二卷，刻於順治十三年（1656），乃裔介選清初十三年間詩人之作合乎風雅者，「上自朝士之詞章，下及草野之謳詠」，¹⁸欲借此揚騷雅之正統，觀政治之興盛。其〈自序〉云：「名曰《觀始集》，欲天下共觀於風雅頌四始之義，而得其性情

¹² [清]魏荔彤輯：《魏貞庵先生年譜》（光緒五年（1879）定州王氏謙德堂刻本），頁5上。

¹³ 同前註，頁9下-10上。

¹⁴ 同前註，頁18下-19上。

¹⁵ 同前註，頁21上。

¹⁶ 同前註，頁36上。

¹⁷ 同前註，頁38上-40上。

¹⁸ [清]張天植：〈觀始集序〉，引自謝正光、余汝豐編：《清初人選清初詩彙考》（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23。

之正也。且其始克立，其卒有成。《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方來而未止也。」¹⁹全書以詩體分卷，共錄古詩、律詩、絕句、樂府、騷、謠等諸體詩 1282 首，涉及清初 376 位作者。除卻吳偉業、魏象樞、王崇簡（1602-1678）、傅維麟（1608-1667）、王鐸（1592-1652）等幾家詩作超過十首外，多數詩家只收二、三首而已。詩後間附簡評。此集收編範圍廣，入選作家多，堪稱清初第一部大型當代詩選本。

《今詩溯洄集》十卷，最早刊本刻於康熙元年（1662）。此編繼《觀始集》而作，取《詩經·蒹葭》「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之義，自稱「詩人好賢，溯洄於方舟之間，不敢言勞。余茲溯洄於鉛槧之間，豈敢薄視風雅，使文人心靈淹沒無聞，而不表見於後世乎？」²⁰此選意求備一時之人，故限於卷帙，不能備一人之詩。其中，收詩較多者有楊思聖（1617-1661）、梁清標（1620-1691）、申涵光（1618-1677）、龔鼎孳（1615-1673）、曾畹（1621-1677）、彭楚伯、王士禎（1634-1711）、魏裔衮（1620-?）等，仍以官場同僚、親朋摯友以及後學先進為主。收詩體例與《觀始集》相仿，亦為按體分編，與之不同的是，《觀始集》中未收錄魏氏作品，而在《溯洄集》每體之末，均附有己作，且所收竟達 158 首之多。另卷首錄有論詩二十則，多用同時代的宋肇（1634-1713）、賈開宗（1595-1661）之言，次為編者論詩語五十則，魏氏詩學觀點與此可窺一斑。相較而言，選本正集中魏氏評點則或言詩意，或評詩風，言簡意賅，間顯理學氣息。

魏裔介除卻編選、評定他人文學作品之外，自己的著述也相當豐富。下面將魏裔介平生主要著作按照經、史、子、集分類列表，以期略窺魏氏著述之情形。

表 1：魏裔介作品簡錄²¹

分類	著作名稱
經	1、《孝經注義》一卷；2、《四書大全纂要》無卷數；3、《朱子四書全義》六十三卷。
史	1、《兼濟堂奏議》四卷；2、《聖學知統錄》二卷；3、《聖學知統翼錄》二卷；4、《刪補高士傳》三卷，晉皇甫謐撰，魏裔介刪補。撰《續補》三卷；5、《康熙柏鄉縣志》十卷；6、《鑒語經世編》二十七卷；7、《廿四史經濟

¹⁹ [清]魏裔介：〈觀始集自序〉，同前註，頁 27。

²⁰ [清]魏裔介：〈今詩溯洄集序〉，同註 2，頁 106。需要說明的是，魏氏此部選本在《兼濟堂文集》中名為《今詩溯洄集》，在康熙元年（1662）刻本中名為《溯洄集》，卷首盧傳序則稱為《清詩溯洄集》。三種名稱，實為一書。

²¹ 本表所錄作品或有明確館藏信息，或已散佚但有書目明確著錄者，涵括撰著、編纂等形式，具體版本、著錄、館藏等內容可參考齊仁達：《魏裔介生平與著作研究》（上海：復旦大學碩士論文，2010），頁 56-87。

	掌故彙編》二十八卷。
子	1、《教民恒言》一卷；2、《致知格物解》二卷；3、《周程張朱正脈》不分卷；4、《論性書》二卷；5、《靜怡齋約言錄》二卷；6、《瓊琚佩語》一卷；7、《巡城條約》一卷；8、《風憲禁約》一卷；9、《柏鄉魏氏傳家錄》二卷附《家約》一卷；10、《勸世恒言》一卷；11、《樗林三筆》五卷；12、《多識集》十二卷；13、《槐下新編雅說集》十九卷；14、《佳言玉屑》一卷；15、《牛戒續鈔》三卷；16、《希賢錄》十卷；17、《資塵新聞》七卷。
集	1、《嶼舫詩集》七卷；2、《兼濟堂詩選》十卷，《文選》十四卷，《疏稿》二卷；3、《昆林小品集》二卷；4、《嶼舫近草》二卷；5、《嶼舫詩留》八卷；6、《林下集》一卷；7、《兼濟堂文集》十卷；8、《兼濟堂詩集》八卷，《文集》二十四卷；9、《兼濟堂文集》二十卷；10、《魏貞庵先生文集》八卷；11、《兼濟堂文集》十二卷；12、《兼濟堂詩話》卷數不詳；13、《金甕傳奇》 ²² 一部；14、《南和十二景詩》一卷，魏裔介等撰。

從上表可以看出魏裔介著書立說的三個特點：其一是闡述理學思想之著作與個人文學創作或選評文學總集之間用力均衡，並無軒輊。其二是魏氏的文學創作體裁多樣，並不局限於詩文。《資塵新聞》七卷「鈔撮雜說而成」，²³體裁類似志怪小說；《金甕傳奇》則已屬傳奇劇本。其三是從集部所記魏氏詩文集刊刻的頻次來看，魏裔介的文學作品在當時已經得到較為廣泛的傳播。上表所錄卷數有異的詩文集，其實是分屬不同時期的版本，這在魏裔介〈兼濟堂諸刻自序〉中已有申明：

余自入籍以後，未免效顰學為文辭。丙午（1666）之歲，彭士報、吳伯其刻之於江南，有《兼濟堂文選》，其文二百餘篇；庚戌（1670）之歲，胡同升刻之於京師，有《昆林小品》，其文一百三十六篇；甲寅（1674）春日，余自刻《林下集》八十一篇；及秋杪，兒輩又刻辛亥（1671）以前未刻者，其文一百一十九篇。已汗牛充棟矣。其諫垣、總憲奏疏稿，共一百一十七道，內閣奏疏十道，《嶼舫詩集》、《近集》共詩一千三十六首，《尺牘四六》四冊。²⁴

此序作於其致仕後的康熙十三年（1674），至康熙五十年（1711）詹明章（1628-1720）

²² 參看劉水雲：〈明清戲曲家新考——魏裔介〉，《溫州師範學院學報》2003年第6期，頁35。

²³ 〔清〕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同註7，卷一三三，頁1130。

²⁴ 〔清〕魏裔介：〈兼濟堂諸刻自序〉，同註2，頁3。

為魏裔介文集重新編訂時所見情形又有增加。²⁵可見，魏氏詩文作品在其生前生后屢次刊刻，地域範圍覆蓋大江南北，且卷帙繁富。若暫且不作質量評估，單從作品數量和傳播範圍來看，魏裔介堪與其時文壇名宿比肩。當然，魏氏其時身居高位也是一個重要影響因素。

（二）與其時文士的詩文交往

魏裔介平生交遊甚廣，或深交摯友，或浮來暫往，其中既有同僚官員，也有遺民文人；既有學者大儒，也有師友後學。就文學方面而言，龔鼎孳、吳偉業、李燾（1625-1684）、梁清標、楊思聖、喬鉢、楊繼芳、宋徵輿（1618-1667）、魏象樞、郝浴（1623-1683）、宋琬（1614-1674）、王崇簡、田茂遇、申涵光、沈荃（1624-1684）、宋犖等與魏裔介均詩文交往，其中關係甚密者要數楊思聖、申涵光、梁清標、吳偉業、田茂遇、宋犖等人。

1、楊思聖，字猶龍，號雪樵，直隸鉅鹿人。順治三年赴京科考，與魏裔介同獲登進士，此後授編修，纂修實錄，歷任春坊侍讀學士、山西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四川左布政使等職。自相識至楊氏歿，二人交往幾近三十年，「以文章道義相齟切，負海內重名，天下之稱之者必曰楊、魏。」²⁶魏裔介曾經專文回憶了他們詩文唱酬的情形：「憶初相遇，意氣蜂涌，被酒招呼，兩人即以性命期許。已同籍，同朝，風雨如晦，無間朝夕，游履所至，皆有歌詠，筆札往來，殆成卷軸。公既在外，以山川契闊之故，猶託毫素以論心。及辛丑（1661）之來京師也，殷殷執手，淒然更不勝情。」²⁷確實，在魏氏《兼濟堂文集》中，他與楊思聖的詩文唱酬最為密切，對楊氏詩文成就評價頗高：「今大河以北，燕、趙之間，豪於詩者，則必首推吾同年楊子猶龍氏。」²⁸認為「猶龍詩才之妙，清新俊逸，兼以波瀾老成，出風入雅，鳳翔鸞翥，歷下、竟陵之學，不足道也。」²⁹

魏、楊二人交情篤厚，很大原因是出於二人人品性格和文學觀點的相似，這在魏裔

²⁵ 詹明章〈兼濟堂諸刻自序〉：「總計篇目，其刻之江南也，有《兼濟堂文集》一十四卷；其刻之荊南也，有《兼濟堂文集》二十四卷；其刻之京邸也，有《文選二集》上下二編，《昆林小品》上下二編，《昆林外集》一編，奏疏一百一十九首，《尺牘存餘》七卷；其刻之林下也，有《文選》十卷，《嶼舫近草》五卷，《詩集》七卷，《樗林三筆》五卷。」見〔清〕魏裔介著、魏連科點校：《兼濟堂文集》，同註2，頁8。

²⁶ 〔清〕徐世昌：〈文學傳〉1、〈楊思聖〉，《大清畿輔先哲傳》（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頁589。

²⁷ 〔清〕魏裔介：〈四川布政使鉅鹿楊公猶龍墓誌銘〉，同註2，頁304。

²⁸ 〔清〕魏裔介：〈楊猶龍詩序〉，同前註，頁108。

²⁹ 〔清〕魏裔介：〈楊猶龍續刻詩集序〉，同前註，頁114。

介為楊猶龍所寫的祭文中有所詳細地闡述：

方丙戌（1646）、丁亥（1647）之間，滄波橫流，人心糜爛，世不復知有名教行檢為何物。獨我友痛惡幽昧險隘之徒，每見於文詞，坐談間如青精之與澉渤，較然其不雜也。以是不悅者眾。若聲詩一道，世皆驚於六朝綺縵之習，高者步趨隆、嘉諸公，以為有軒冕臺閣氣。獨我友與余，推尊少陵，挽回狂瀾之東而砥柱之。³⁰

可見，不滿詩風日下、推尊少陵是二人的共同志趣。魏裔介曾經如此評價猶龍之五言古詩：「自少陵秦州、夔門諸作絕響千年後，乃復有此。」³¹至於楊思聖對於魏裔介的評價，在其〈嶼舫詩集序〉中有所闡說：「吾友魏石生雙眸炯炯，智勇深沉。讀書論世，明於治亂之故。……出其緒餘為詩，雄渾蒼茫，自快胸臆。」³²

2、申涵光，字孚孟，一字和孟，號鳧盟、聰山等，明太仆寺丞申佳胤（1603-1644）長子，直隸永年（今河北永年縣）人。甲申（1644）之亂，佳胤殉國難，涵光痛絕復蘇，避亂於西山，入清后隱居不仕。申氏性簡傲，以詩名河朔，然與清初名臣和明末遺民皆有往來。³³

魏裔介與申涵光的交往，始於文字之緣：「余聞申子鳧盟有年矣，未及一握手也。數過猶龍，案頭得讀鳧盟詩數篇，為之擊節。」³⁴二人的初次見面則源於魏裔介順治九年（1653）的兩次關於褒錄明季殉難之臣的上疏，這在魏裔介的〈申鳧盟傳〉中有詳盡敘述：

會詔訪前朝死難諸臣，舉封墓之典。余時為諫議，上〈褒錄幽忠疏〉，共二十餘人，端愍公（筆者按：即申涵光之父申佳胤）姓名列奏中。已而格於部議，余一疏再疏爭之，卒與祀典。鳧盟乃跣足至京，匍匐座側，曰：「先人之忠節，垂諸不朽，大諫之力也。」余曰：「公道不可泯耳，何敢為德？」

³⁰ [清]魏裔介：〈祭方伯楊猶龍年兄文〉，同前註，頁334。若結合魏裔介出任清廷之原由來深究此段文字，則會發現，不論對於崇禎末年之民不聊生，還是順治初年之人心糜爛，魏氏均持批判態度。故此說明，傳統知識分子固有的「濟世之志」才是魏裔介貫穿始終的人生信條。

³¹ [清]魏裔介：《溯洄集》（康熙元年（1662）刻本），卷一，頁6下。

³² [清]田茂遇輯：《燕臺文選初集》（順治十三年[1656]刻本），卷三，頁26下。

³³ 申涵光交遊甚廣，既有魏裔介、梁清標、魏象樞、王崇簡、王士禛等清初名臣，也有傅山、顧炎武、孫奇逢張鏡心等遺民文人。這種情形與清初的輿論環境頗有關係，可參看陳永明：〈降清明臣與清初輿論〉，同註1，頁197-228。

³⁴ [清]魏裔介：〈申鳧盟詩序〉，同註2，頁115。

蓋鳧盟舊與余弟辯若相識於燕邸，而余之識鳧盟實始此也。³⁵

自此以後，二人或數年而一遇，或一年而一遇，遇則必相傾倒，不遇則詩文往來不斷。魏裔介也因為此事，聲名大振，「一時士大夫高其行，皆傾心納交，宴游贈答無虛日。」³⁶

關於申涵光的學詩路徑，魏裔介評曰：「一以少陵為宗，而沐浴於高、岑、王、孟。」³⁷恰好魏裔介為詩也崇尚杜甫（712-770），故申涵光在康熙十二年（1673）春饋贈杜甫像給魏裔介，魏喜而詠詩道謝：「既獲子美像，又得杜詩鈔。拜像慰我心，讀詩締石交。」³⁸魏裔介對申涵光在其時文壇的地位評價甚高，同時對其現實境遇給予同情，如〈送申鳧盟歸平干〉一詩所云：「詩名燕市噪，樽酒夜燈寒。白雪空山裏，何人歌猗蘭。」³⁹在得知申涵光去世后，魏裔介悲痛不已。他在為申涵光所寫的祭文中直接抒其哀痛：「嗚呼！猶龍死而余不言詩，北海死而余不言學，鳧盟死而余尚言文耶？……余之泣下霑襟，何為而然耶？有肉在豆，有酒在樽，其能如生前之日夕歡相持耶？」⁴⁰可見二人之交誼如魏氏所言：「余與鳧盟，稱莫逆交。」⁴¹

3、梁清標，字玉立，號蕉林，又號棠村、蒼巖，直隸正定人，明崇禎十六年（1643）進士，清順治元年（1644）補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歷任宏文院編修、國史院侍講學、詹事府詹事、禮部左侍郎、吏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兵部尚書、禮部尚書、刑部尚書、戶部尚書等職。

魏裔介與梁清標早年是書院同窗，⁴²後又同朝為官，且有姻婭之親，⁴³彼此十分瞭解。魏氏自言「與玉立為髫鬢之交，況數載以來，復承朝廷恩遇，或同侍帷幄，或共承飲譙。玉立之文章德業，吏治武功，亦稍稍睹記其梗概。」⁴⁴可見梁氏雖官職顯赫，仍不輟詩文，汪懋麟（1640-1688）對此亦有論述：「棠村公領尚書事垂二十年，功名既赫

³⁵ [清]魏裔介：〈申鳧盟傳〉，同前註，頁299。

³⁶ [清]趙爾巽等：〈列傳〉271、〈文苑一〉《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484，頁13321。

³⁷ 同註35，頁300。

³⁸ [清]魏裔介：〈癸丑春，申鳧盟寄我杜子美像，大名道孔心一寄我杜詩鈔，喜而有詠〉，同前註，頁475。

³⁹ [清]魏裔介：〈送申鳧盟歸平干〉，同前註，頁505。

⁴⁰ [清]魏裔介：〈祭申鳧盟文〉，同前註，頁332。

⁴¹ 同註35，頁301。

⁴² 《魏貞庵先生年譜》「丙寅，公二十三歲」條記載：「春，真定太守范成六公選三十二城士入恒陽書院讀書，公居第一。與梁邇之、梁玉立、杜子靜諸公迭為恒郡首卷。」參見註12，頁4下。

⁴³ 《魏貞庵先生年譜》「乙丑，公七十歲」條記載：「春正月，公四女出適真定梁氏，婿名允莊，蒼巖相國之胞弟子也。」參見註12，頁51下。

⁴⁴ [清]魏裔介：〈梁玉立悠然齋詩序〉（即〈蕉林詩集序〉），同註2，頁109。

奕矣，猶篤學不倦，每退朝即簾閣靜坐，嘯詠自娛。所著詩古文，傳誦遍海內。」⁴⁵正是源於這個共同的嗜好，二人雖為官場同僚，政事瑣碎，然詩文研討仍為交往中之重要內容。徐世昌《晚晴移詩匯》便提及二人論詩之事：「文毅風節侃侃，論事鯁切，與敏果時稱『二魏』。所陳多關國家大典。嘗與梁蕉林論詩，持『貴真不貴偽』之說……蕉林極韙之。」⁴⁶這和魏裔介對於梁清標詩歌的評價非常吻合：「玉立之為詩，不屑屑模擬三唐陳蹟，亦不屑屑取青媲白，如近人彷彿於鱗七子等聲調氣格之間。」⁴⁷

4、吳偉業，字駿公，號梅村，江蘇太倉人，明末清初著名文人。自順治十年（1653）仕清后與魏裔介頗有詩文交往。順治十一年（1654）春夏之際，吳偉業與好友楊繼芳論詩時便流露出對魏裔介的推崇：「余讀書海畔，每恨江左諸子，雖復風流可觀，不無靡靡之響。中原獨步，不得不推魏裔介矣。」⁴⁸尤其愛讀魏氏的懷古詩，曾作〈讀鄆城魏石生懷古詩〉：「長安雪後客心孤，畫省論文折簡呼。家近叢臺推意氣，山開全趙見平蕪。憂時危論書千卷，懷古高歌酒百壺。」⁴⁹魏裔介其後也作詩回贈，名為〈吳駿公贈余有「自是漢廷真諫議，蕭王陌上賦東都」之句，賦此答之〉：「雄譚相視客懷孤，竹檻高齋鳥共呼。燕市悲歌多酒侶，延州風雨半平蕪。文成絕調空春雪，道有冰心在玉壺。北面丹書須帝佐，豈因作賦重三都。」⁵⁰

順治十三年，魏裔介《觀始集》付諸剞劂，吳偉業為之作序：「《觀始集》者，鄆城魏石生先生合海內之詩選之以名其編者也。鄆城之自為詩，深究本原，窮極體要，乃以選者弗規於正也，京師輶軒之所集，遂窮搜博訪，朱黃點勘，積有歲月，始定為若干卷，而授偉業序之。」⁵¹魏裔介在其自序中也提及了幾位與之交情篤深的朋友，吳偉業自然是其中一位。⁵²康熙二年（1663），吳氏仲子隣生，魏裔介作詩致賀，⁵³與此相應，吳偉業康熙七年（1668）為魏氏《兼濟堂文集》撰序，也高度評價了這位友人的為政、

⁴⁵ [清]徐鉉：〈後集〉卷八，《本事詩》（光緒十四年[1888]邵武徐氏刊本），頁29下。

⁴⁶ [清]徐世昌輯：《晚晴移詩匯》（民國十八年[1929]退耕堂刻本），卷二十三，頁4上。

⁴⁷ 同註44。

⁴⁸ [清]楊繼芳：〈譚詩集說〉，《頤中堂詩文二集》卷七，引自馮其庸、葉君遠著：《吳梅村年譜》增訂本（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7），頁247。

⁴⁹ [清]吳偉業著，李學穎標校：《吳梅村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卷十五，頁406-407。

⁵⁰ [清]魏裔介：《嶼舫詩集》卷四，引自馮其庸、葉君遠著《吳梅村年譜》增訂本，頁247。

⁵¹ 同註49，卷二十七，頁660。

⁵² 魏裔介在《觀始集》自序中曰：「余與楊太史猶龍、魏光祿環極誼諧瓊麓；吳太史梅村、李學士坦園交締縞紵，每一論及，未嘗不有人心世道之憂。」參見謝正光、余汝豐編：《清初人選清初詩彙考》，頁26-27。

⁵³ 魏裔介〈寄吳梅村中允〉：「三年別海上，憶爾望金臺。弓鼎軒皇去，山河庾信哀。桃花村舊譜，梅影漾新懷。再索雙珠樹，欣覩吐鳳才。」見[清]魏裔介著、魏連科點校：《兼濟堂文集》，同註2，頁515。

為學和為文。⁵⁴

此外，魏裔介在順治年間還是京師燕臺社集的核心人物，與田茂遇、宋肇等文士亦多有詩文唱酬，限於篇幅，不再羅列。⁵⁵

（三）魏裔介的文學創作

魏氏一生筆耕不輟，無論身處京師，還是閒居林下，皆是如此。其好友申涵光對此深為感佩：「今海內好學不倦，以予所見，未有若魏相國崑林先生者。先生自入仕路，由華要登揆席，其間籌國阜明，持己接物，無一事不悉心裁度，畢當於理，可謂勞矣。乃手不釋卷，口不停吟，所著之書，日新月異，精神過人數倍。吾未見其耦也。既休沐歸鄙上，謝絕一切，益耑力於讀書。」⁵⁶翻檢其畢生的文學著作可知，魏裔介的文學創作主要集中在詩、文兩大類。詩歌方面，送別詩、唱酬詩、田園詩、懷古詩和感懷詩等題材內容，不一而足；散文方面，奏疏、序跋、書傳、論說、募啟、祭碑文、墓誌銘等諸體皆備，文風質樸，成就突出者為奏疏、序文和論體文。由於魏裔介的散文創作已有專論，⁵⁷為免重複，下面將專論魏裔介的詩歌創作。

1、魏裔介詩歌的題材內容

魏氏詩歌若按照創作數量來排序，則可大略分為唱酬送別、感懷述志、詠史懷古三類。儘管這三類詩各自表現的主題有所側重，但總體而言，魏裔介的詩歌主題或是對出處進退的理性思考，或是對師友親朋的深情厚誼；或是對民生疾苦的積極關注，或是對田園生活的熱情嚮往。下面分而論之：

首先，唱酬送別詩類屬應酬詩體，若無真情實感寄寓其中，乏善可陳之作必夥矣。綜觀魏氏此類詩作，雖曰在詩集中所佔比重最大，但是可圈可點之作不少。部份詩歌流露出對人生世事的感悟，如〈送友人白青玉歸〉：「故園一片月，相照共生平。儉歲無憂色，山田惟力耕。牀頭留舊釀，世事盡浮名。余亦明年去，閑看春草生。」⁵⁸孫鉉在《皇清詩選》中評曰：「讀之使名利之心都盡。」⁵⁹〈送宮紫玄歸廣陵〉詩亦曰：「薊

⁵⁴ 即前文提及之「理學、文章、政事，公殆兼而有之」，參見註8。

⁵⁵ 在其後的文學創作分析中，還會提及魏裔介與魏憲、鄧漢儀等人的詩文交往。

⁵⁶ [清]申涵光：〈林下集詩序〉，《聰山文集》（康熙二年（1663）《聰山集》叢書本），卷一，頁13上。

⁵⁷ 參見張壇茹：《魏裔介散文研究》（保定：河北大學碩士論文，2010）。

⁵⁸ [清]魏裔介著、魏連科點校：《兼濟堂文集》，同註2，頁510。

⁵⁹ [清]孫鉉輯評：《皇清詩選》，康熙二十七年（1688）刻本，卷十一，頁6上。

北黃金貴，淮南桂樹幽。送君從此去，濯足大江流。」⁶⁰詩人刻畫出友人希望回鄉過隱居生活的心緒，大有在朝不如在野的感歎。部份詩歌則抒發了親朋好友間的深情厚誼，如七言古詩〈贈別申覺盟〉，魏氏就提及與申涵光、殷岳（字伯嚴，1603-1670）及白涵三等人的友情。鄧漢儀（1617-1689）《詩觀二集》評曰：「涵三、伯嚴、覺盟河朔三高士不足奇，奇在貞庵相國之忘分，敦好此誼，遂為信陵以來所不經見，詩能歷落寫出。」⁶¹當然，在與好友的聚會或交往中，伴隨著場合、氛圍的變化，詩人的情感也多有起伏。與好友相逢小酌時，詩作中流瀉出的是「天留我輩作狂生」⁶²的狂放；與好友送別分離時，詩人抒發的是「世事風波江水流」⁶³的感傷；與好友陰陽相隔時，詩人抒發的情感則是「契闊情何限，啣哀腸斷時」⁶⁴的悲慟。

其次，感懷述志詩雖然在數量上不及唱酬送別詩，但卻是魏裔介詩歌中最有價值的部份。作為一名身居高位的朝廷諫官，魏裔介關切國家政事，心繫民生疾苦，建言獻策，矢心為公。這不僅體現於他的奏疏之中，還不時地即事感懷，發為詩歌。如順治十一年（1654）春，直隸、河北、山東等地遭遇水患，流民死傷無數，魏裔介上奏〈流民死傷堪憫疏〉，言及其時流民之慘狀：「有父母夫妻同日縊死者，有先投兒女於河而后自投者，有得錢數百賣其子女者，有刮樹皮挾草根而食者。至於僵仆路旁為鳥鳶豺狼食者，又不知其幾何矣。」⁶⁵同時亦用詩歌記錄下流民生活中最為悲慘的一幕：

望望棄故里，蹙蹙度層阿。積雪愁未盡，寒雨漫長坡。豈不念鄉閭，命也嬰禍羅。行期計匝月，遙望見滹沱。滹沱何澎湃，春風增白波。對此心慌惕，四顧空延俄。饑夫前致詞，亦欲度此河。離鄉日已遠，無食一身多。況今襁褓婦，黃口一肩馱。但獲渡濟去，冥報其有他。舟子瞠目視，笑為船上歌。饑夫語饑婦，我當葬蛟鼉。爾挾懷中雛，丐食行逶迤。饑婦更無語，長號赴奔渦。饑夫投其雛，捐命同飛蛾。是時天地暗，慘色起嵯峨。饑民岸林立，

⁶⁰ [清]魏裔介著、魏連科點校：《兼濟堂文集》，同註2，頁508。

⁶¹ [清]鄧漢儀：《詩觀二集》（康熙間慎墨堂刻本），卷二，頁29上。全詩內容錄下：數年不見心若失，一年不見心轉迷。春消夏長子來思，夜飲香醪醉不知。平頭奴子歌吳曲，百轉流鶯耳半癡。子才超蹕如驥裏，不上春宮愛紅蓼。依人羞登王粲樓，訪友常理山陰棹。好奇兄弟似岑參，閉戶讀書千百函。每至孫登長嘯處，笑指堯夫舊草庵。余也仕宦風塵久，潦倒天涯將白首。今世知我有涵三，又有伯嚴稱黃耆。與子落落成三人，不分廊廟及畎畝。興酣搖筆驚鬼神，愁來白眼拋敝帚。學宗滄海祖岱嶽，孰問行潦並培塿。子今歸去洺水東，烹煉丹砂慕葛洪。扶持元氣瀕虛空，三十六帝外臣同。臨別何必灑淚紅，待余青鞋布襪，枕石漱流，彈琴而詠先生之風。

⁶² [清]魏裔介著、魏連科點校：《兼濟堂文集》，同註2，頁554。

⁶³ 同前註，頁525。

⁶⁴ 同前註，頁500。

⁶⁵ 同前註，頁19。

咽泣共跌蹉。哀哉今之人，而不如駕鵝。⁶⁶

詩人攫取災民南逃過程中的一個鏡頭：夫妻攜子過河，船夫索要船資，因身無分文欲投河自盡，命妻抱子乞討活命。妻子更覺無活路，先行投河。丈夫悲傷不已，與子共投入河中。這種寫法顯然繼承王粲（177-217）之〈七哀詩〉和杜甫之〈石壕吏〉，以最為典型的個案來概括民生之多艱，控訴其時圈地政策對人民的戕害。此詩語言簡樸，風格悲涼沉痛，孫鉉評曰：「慘極，不堪再讀。」⁶⁷鄧漢儀亦評曰：「情事極慘，卻有此深情老筆，一為傳照。其樸處、真處皆得史遷神髓，豈非〈石壕〉、〈彭衙〉而後，又見此作？」⁶⁸此外，其樂府詩〈哀流民〉也言及此事，⁶⁹只是略顯模擬痕跡。同類詩作尚有〈三河縣〉、〈秧歌行〉等。

魏裔介在為官期間，曾作六首〈春日感懷〉和十首〈夏日感懷〉，這兩首組詩則集中反映了魏裔介厭倦官場、嚮往田園的複雜心態。一方面，魏氏自感身居京師，如在樊籠。百官只顧追逐名利，而無真才實學。「舉世尚浮華，冠蓋自赫奕。問以經濟方，相對如窮甕。咄咄殷深源，虛名竟何益。」⁷⁰遂有「終當脫丹轂，挾冊赴長林」⁷¹之感。其實，創作〈夏日感懷〉詩時，魏裔介才四十歲而已，⁷²正值其仕途的上升期，有此感悟，實為厭惡名利場之表現。而另一方面，魏裔介也在這兩首組詩中，流露出對田園生活的欣羨之情。在〈春日感懷詩〉其二中，魏裔介描繪了一幅躬耕田園、自然怡得的鄉村圖景：「種樹以為林，結茅以成屋。家有負郭田，聊足供饘粥。春風樹若黛，秋雨山如沐。二三老農人，戴笠牧黃犢。」⁷³同樣，〈夏日感懷〉中亦有對自由田園生活的嚮往：「倦鳥思故山，有巢在荒蕪。時因晨風發，良懷佳句新。」⁷⁴這種心態至辭官閒居

⁶⁶ 〈投河嘆〉自序：甲午春，流民南走如蟻。有夫婦至滹沱河欲渡，舟子索值，無以應，遂並其子女赴河死。余聞而哀之，作投河嘆。見〔清〕魏裔介著、魏連科點校：《兼濟堂文集》，同註2，頁465。

⁶⁷ 〔清〕孫鉉輯評：《皇清詩選》，同註59，卷二，頁8上。

⁶⁸ 〔清〕鄧漢儀：《詩觀二集》，同註61，卷二，頁27上-下。

⁶⁹ 魏裔介〈哀流民〉：「田廬水沒無乾處，流民紛紛向南去。豈意南州不敢留，白晝閉戶應躊躇。簷前不許稍踟躕，恐有東人不我恕。上見滄浪之天，下顧黃口小兒，命也如何，婦語絮絮：『逃人逃人兮，爾獨何為背爾主？使我罹此荼毒，我將爾詛，我欲爾詛，其口維歟。』路有杖杜，縊者誰子，烏鳶嘒嘒，既喙而翫。彼蒼者天，哀此黎庶。」見《兼濟堂文集》，同註2，頁433。

⁷⁰ 〔清〕魏裔介著、魏連科點校：《兼濟堂文集》，同註2，頁458。

⁷¹ 同前註，頁459。

⁷² 魏裔介〈夏日感懷〉其七曰：「年未逾不惑，白髮忽來侵。」其十曰：「四十竟無聞，坐惜光華旦。」可見這首組詩是魏裔介四十歲時所作，時任兵科都給事中不久。參見《兼濟堂文集》，同註2，頁459-460。

⁷³ 〔清〕魏裔介著、魏連科點校：《兼濟堂文集》，同註2，頁472。

⁷⁴ 同前註，頁460。

時期更為明顯，〈述懷〉八首和〈八居詩〉八首即是代表。顯然，魏裔介不僅通過親身經歷，還藉由詩歌作品，實踐了傳統士大夫「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精神品格。

再次，魏裔介的詠史懷古詩也頗有特色，或藉遊覽古跡觸發滄桑變化之感，歷史興亡之嘆；或藉史實故事以古喻今，借古諷今。此類主題大都集中於其入仕前後的遊記詩中，魏裔介曾曰：「凡余之所遊者，固人之所共遊，然憑弔俯仰，亦各有懷，聊以志一時聞見而已。」⁷⁵如〈過定州觀雪浪石〉：「不由坡公識，誰知雪浪石。鴻濛歸片碣，江漢入濤聲。勝蹟金元變，奇懷涕淚橫。地經百戰後，瓦礫滿山城。」⁷⁶雪浪石本為河北定州、曲陽等地所產之花崗岩，相傳蘇東坡（1037-1101）任定州知州時偶得此石，因形狀彷彿浪涌雪沫，故曰雪浪石，並有多首詩歌為之吟詠。魏氏此詩藉寫雪浪石生存狀態之變化，感慨歷史之巨變，人世之滄桑，且流露出懷才不遇之感。故鄧漢儀評曰：「他人祇贊雪浪石耳，此篇寫入滄桑，筆力奇橫，遂爾目空千古。」其中「不由坡公識，誰知雪浪石」句有夾批曰：「此是借題抒寫胸中，他人豈能及此。」⁷⁷另如〈涿州公廨中古槐〉：「王謝堂前燕已飛，西京禾黍幾歔歔。行人若問興亡事，古樹年年對夕暉。」⁷⁸孫鉉評曰：「一槐耳，題曰古槐而歷以今字，形出之言外自餘嗚咽。」⁷⁹

魏氏部份詠史懷古詩還發表了對某些歷史事件的真知灼見，凝結了詩人對歷史規律的理性思考，如〈獲鹿道中過淮陰祠〉中對韓信的評價是「相背豈君意，假王是禍胎」，鄧漢儀認為：「『相背』二語是千古定案。」⁸⁰另外，其〈過定興拜楊忠愍公墓〉中有「正氣無古今」之語，亦可謂是古今定論，「可抒一部十七史忠憤之氣。」⁸¹

此外，魏裔介尚有田園詩、論詩詩、詠物詩等若干首，皆有特色。

2、魏裔介詩歌的藝術成就

首先，魏裔介的詩歌風格多樣，或傲岸蒼渾，或豐神淡遠，但皆不失清和雅飭。雄渾者如〈春日過盧溝橋〉：「桑乾直下連滄海，夭矯青龍控帝畿（一本作「接御堤」）。寥落長空寒過鴈，朦朧煙樹曉聞鷄。香山晴氣歸天闕，榆塞風霜上馬蹄。咫尺五雲頻眺望，春風已到帝城西。」孫鉉《皇清詩選》評云：「『氣蒸雲夢，波撼岳

⁷⁵ 同前註，頁 394。

⁷⁶ [清]鄧漢儀：《詩觀二集》，同註 61，卷二，頁 30 上。

⁷⁷ 同前註。

⁷⁸ [清]魏裔介著、魏連科點校：《兼濟堂文集》，同註 2，頁 440。

⁷⁹ [清]孫鉉輯評：《皇清詩選》，同註 59，卷二十八，頁 3 下。

⁸⁰ [清]鄧漢儀：《詩觀二集》，同註 61，卷二，頁 29 上。

⁸¹ [清]孫鉉輯評：《皇清詩選》，同註 59，卷十一，頁 6 上。

陽。』膾炙久矣，此復駕而上之。」⁸²這顯然是和孟浩然（689-740）詩〈望洞庭湖贈張丞相〉作比較。不過，魏氏此詩更多地是學習李白（701-762）「擲筆振金石，有文懸瀑布」⁸³的氣勢，營造出驚心動魄、氣象雄渾之意境。魏憲《詩持一集》對此亦高度稱讚云：「唐人佳製，絕非纖巧者可幾。」⁸⁴閒適者如〈榆莊〉：「逐隊豈吾願，尋幽事事嘉。春寒蜂護蜜，地僻鳥棲花。落日山粧靚，孤村煙縷斜。款扉有野客，白酒向鄰賒。」⁸⁵此詩兼具陶淵明（365-427）「富貴非吾願」的淡泊名利以及孟浩然「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的閒適恬淡。〈淇瞻劉年丈邀集徐園，同猶龍太史青嶠給諫即賦〉其二：「縱下憂時淚，何妨醉碧岑。虛檐侵鳥道，危檻迫濤音。晚水斜陽照，高城岸柳陰。忽驚雙鬢老，燒燭共長吟。」孫鉉亦評曰：「閒情逸韻，自爾悠然。」⁸⁶

另外，我們從《今詩溯洄集》的評點中亦可大略看出魏裔介詩風喜好的多樣化。如評孔胤樾五言古詩〈田家雜詠〉組詩曰：「諸作幾欲奪浣花之席，不止得其皮膚。」評杜芳（1602-？）五言律詩〈夜渡〉曰：「有長吉之瑰瑋，而無其詭，直與子瞻同其浩渺。」評丁裕初之〈呂梁洪〉曰：「氣韻沉雄，權奇天馬。」評吳淇之五言近體詩為「矜筋近於自然，殊無浮響」。⁸⁷可見，在其選文過程中，魏裔介同樣秉持著多元化詩風的主張。

其次，情真意切，鮮有台閣氣。魏裔介寫詩作文，與其他台閣大臣最大的不同點就是，作品不論工拙，風格或健或逸，皆能有感而發，情真意切，杜絕無病呻吟或質木無文之作。這在魏氏的詩歌創作中體現地尤為明顯，具體表現為真心對待親朋好友的情誼，認真面對歷史經驗的反思以及真切關懷當下現實的態度。送別唱酬詩如〈春日寄楊猶龍方伯〉：「老鬢欲成絲，寒威春病知。五更常憶友，三載不論詩。白馬黃河渡，檐車嵩岳陞。莫言方伯易，豫土有瘡痍。」公與且亭交情甚篤，故落筆便有真穆之氣。詩中「五更常憶友，三載不論詩」之句更是「真切」之語，連鄧漢儀亦感歎：「讀『三載不論詩』之句，可見乾坤甚大，把酒論文之友原不多得。」⁸⁸即事感懷詩如〈自安定門旋由水關南望德勝門述目所見〉：「曉嶺映朝暉，人家野水邨。樓殘遺堞立，寺廢古鐘存。解凍春雲漾，呼鷹獵馬馴。干戈息數載，猶有哭聲吞。」崇禎末年，李自成（1605-1645）農民軍佔領北京城不久，即被清廷軍隊攻破，李自成在倉皇出逃、撤離北京前，

⁸² 同前註，卷十七，頁6下。

⁸³ [清]魏裔介：〈讀李太白詩〉，同註2，頁456。

⁸⁴ [清]魏憲輯：《詩持一集》卷一，康熙十年（1671）枕江堂刻本，頁37下。

⁸⁵ [清]魏裔介著、魏連科點校：《兼濟堂文集》，同註2，頁498。

⁸⁶ [清]孫鉉輯評：《皇清詩選》，同註59，卷十一，頁5上。

⁸⁷ 分別引自[清]魏裔介輯：《溯洄集》，同註31，卷一，頁31上；卷三，頁12上；卷四，頁7下；卷五，頁23上。

⁸⁸ [清]鄧漢儀：《詩觀二集》，同註61，卷二，頁31上。

下令焚毀明宮殿和各門城樓。作者遊歷此地時，所見之安定、德勝城樓尚未修復，故觸景生情，抒寫滄桑之感。鄧漢儀對此評曰：「偶爾郊行，輒有滿目瘡痍之感。此豈尋常詞人可及？」⁸⁹其結句尤為精警，意蘊深長。

再次，鍾煉詩藝，別具手眼。魏氏作詩，不僅風格多樣、情感真摯，而且在章法結構、辭藻韻律等方面也頗見功力。具體而言即，章法頓挫，矜貴中復有別致；起結得法，偶有奇妙之處；押韻不避奇險，結構虛實相間。如〈九日同子俶遊皈依諸寺〉：「何處登高欲望鄉，愁人今歲怨重陽。豈無竹葉添杯酒，偏有雲山隔雁行。亂插黃花憐老大，故驅禿馬一顛狂。已知城市紛難避，坐擁青箱意不忘。」此詩藉由重陽登高，抒發了歲月荏苒而自覺虛度、久居樊籠而嚮往田園的感歎。此詩在整體意蘊上承繼杜甫之〈登高〉，雖然難比杜詩境界之闊大，但是主題意蘊方面「高、老得杜家深境」，⁹⁰起法亦不落俗套。再如〈曉渡滹沱〉：「有懷翻不樂，東望日初暹。山氣侵城黑，青霜入鬢嚴。長橋古渡圯，流水斷冰兼。欲問東垣郡，寒空鎖堦尖。」描繪了清晨滹沱河渡口的清冷景觀與詩人孤寂的心情，寫景奇拔，用韻大膽。鄧漢儀評曰：「如此用險韻，正覺遊刃有餘，豈非才大法老。」⁹¹無怪乎魏憲在選錄魏裔介詩時云：「先生之知余也以詩，而余之佩服先生也亦以詩。」⁹²

若要追溯魏裔介文學成就的產生根源，除卻個人喜好與自身努力之外，尚有兩個重要原因：一是濃厚家學的熏陶。據《魏貞庵先生年譜》記錄，魏氏先祖代有聞人，其中不乏高才博學、操持嚴正者。延至魏裔介的父親魏柏祥（1593-1649，字元昌，號拙庵），學識奇偉，諸子百家之書，無所不讀。通達時務，詩文卓絕，尤愛賞玩《文選》之詩文，魏裔介在〈選詩選跋〉中有過記載：「余先君拙庵幼讀《選》詩，晚年始加澄汰，去取精嚴，列於四家之首。」⁹³在此家庭環境的耳濡目染之下，魏裔介喜好弄筆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當然，其弟辯若亦「自垂髫能為詩」，且「語必驚人」⁹⁴。二是其時帝王的喜好。清初統治者不僅篤好理學，對於詩文也非常重視。順治帝「褒重儒術，每以詩賦考校詞林，大獵南苑，命諸侍從之臣分題賦詩」⁹⁵；康熙帝更是如此，在與大學士談論理學時曾說：「從來道德、文章原非二事，能文之士必須先明理，而學道之人亦貴能文章。朕觀周、程、張、朱之書，雖主於明道，不尚辭華，而其著作體裁簡要，晰

⁸⁹ 同前註。

⁹⁰ 同前註，頁33上。

⁹¹ 同前註，頁29下。

⁹² [清]魏憲編：〈魏貞庵小引〉，《百名家詩選》（康熙二十一年[1682]枕江堂刻本），卷一，頁1上-1下。

⁹³ [清]魏裔介著、魏連科點校：《兼濟堂文集》，同註2，頁400。

⁹⁴ 同前註，〈辯若弟泛舟吟序〉，頁142。

⁹⁵ 同前註，〈嶼舫友人贈答詩序〉，頁139。

理精深，何曾不文質燦然，令人神解意釋。至近世，則空疏不學之人，借理學以自文其陋，如崔蔚林本無知識，文義荒謬，岸然自負為儒者，真可鄙也。」⁹⁶雖然這段話的言說時間是在魏裔介去世前一年，即康熙二十四年（1685）四月，但是重視理學、文章相統一卻是清初統治者一貫的主張。康熙帝列舉了宋代理學家周敦頤（1017-1073）、程顥（1032-1085）、程頤（1033-1107）、張載（1020-1077）和朱熹（1130-1200），認為他們都是將明道與能文結合為一的榜樣，而對以理學為名卻不能為文的現象，如崔蔚林（1635-1687）之流則提出了尖刻的批評。既然帝王主張道、文統一，故上行下效，其時理學名臣亦能為文也就淵源有自了。

三、魏裔介的文學思想

長期以來，學界對於理學家的文學思想重視不夠，普遍認為其價值不大。實際上南宋以降，理學家的理學思想和文學思想之間就充滿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其一從整體而言，當理學思想被尊為官方學術思想的正統地位時，理學思想對其他文化領域的滲透和影響是顯而易見的，當然詩學和文論等文學思想也不例外。其二從個體角度來說，理學家的思想價值和思維方式直接影響到他們的詩文觀念，進而對其時的主流文壇產生影響。魏裔介作為其時的理學名臣，在詩文創作的同時，也通過序文、選本、筆記以及論詩詩等形式表達了他豐富的文學思想，闡述了他對於文學價值、文學創作、文學風格、文學批評以及文學鑒賞等方面的見解，頗具理論價值。下面擇其精要者分梳如下：

（一）「詩之為道，非小務也」

宋明以來，理學家關於文學價值的理解基本可以概括為「本末論」，即道為本，文為末。這種觀點包含兩層涵義：一是以「本」為「主」，「末」為「從」，即就「主從」關係而言，代表觀點諸如「文皆是從道中流出」⁹⁷、「道之顯者謂之文」⁹⁸等；一是「本尊」而「末卑」，即就「尊卑」觀點而論，諸如聖人之學為第一等德業而以詞章之學為「技之末」等觀點。相對而言，在理學家文學思想方面還是第一層面的「本末論」

⁹⁶ 林鐵鈞、史松主編：《清史編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第二卷，頁506。

⁹⁷ 〔宋〕朱熹著、〔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第八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一三九，頁3305。

⁹⁸ 〔宋〕朱熹著：《論語集注》，《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五，頁110。

較有理論價值。魏裔介關於文學價值的理解基本延續了「本主末從」的觀點，在以道德、事功為本的同時，肯定了文在傳播道德、建立事功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以及文的相對獨立性。

首先，魏裔介認為文與道相輔相成，「志道之士，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之於文者，斯可矣。志於文亦可以悟道，文與道固非二事也。」⁹⁹「古之真詩人未有不見道，真見道未有不能詩者。」¹⁰⁰或者，詩文本身就是「道德」、「功業」的一部份，即如曹禾所言：「先生之文，先生之道德也；先生之文，先生之功業也。」¹⁰¹魏裔介在為許傳巖詩作序時稱：「詩之為道，非小務也，人之性情、學術、事業，俱於此見端。」¹⁰²故對曹丕（187-226）論文之言論深為服膺，「曹子桓云：『文章，經國之大體（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又曰：『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懼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此等語極為警策。」¹⁰³當然，魏裔介還是非常重視道德、事功對於文學的重要影響。在文學發展脈絡的梳理中，他便時常會得出類似「五經者，萬世文章之祖」以及「必得經之意以為文，而後其文足以傳」¹⁰⁴之類的結論。

與此同時，他還提出了「詩之道」的三個組成部份：「一曰道德。道德者不言道德，言之則腐。塵垢富貴，山水自珍，王維、孟浩然、韋應物諸人是也；二曰氣節。氣節者不言氣節，言之則激，彭澤之農、阮籍之狂是也；三曰經濟。經濟者（不）言經濟，治則鼓吹修明，亂則悲憫宗社，杜甫是也。三者之外無詩矣。」¹⁰⁵此番言論將道德、氣節和經濟視為詩「道」之內容，貌似有濃厚的道學氣息，實則不然。因為魏裔介強調在表現這三項內容時，不是採用直接圖解的方式，而是需要用文學的手段去達到現實的功用目的，力求做到不即不離，不沾不滯，是故，魏氏提及的代表作家均為肆力為文者，而非一般的理學家。

其次，魏裔介還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了詩文的獨立性，強調了文學與經史的差異。如其〈嶼舫近草序〉曰：「若余於詩，非篤好之者，而亦時有作。……如蟲之吟也，如籟之鳴也，如花之開謝而水之行止也，以悅吾心，以寄吾況，以答吾友生，以紀吾時

⁹⁹ [清]魏裔介：《靜怡齋約言錄》內篇（清刻本），頁27上。

¹⁰⁰ [清]魏裔介：〈荊園小語序〉，同註2，頁148。

¹⁰¹ 同註9。

¹⁰² [清]魏裔介：〈許傳巖詩序〉，同註2，頁119。

¹⁰³ [清]魏裔介：《靜怡齋約言錄》外篇（清刻本），頁31下-32上。

¹⁰⁴ [清]魏裔介：〈古文欣賞集序〉，同註2，頁76。

¹⁰⁵ [清]魏裔介輯：〈論詩二十則〉，同註31，卷首，頁2上。

序。」¹⁰⁶這裡肯定了文學作品的審美特質和認知功能，而並非僅有載道之職能。另外，他還曾說「《詩》與他經及史無與也，然不諳他經及史者，不可以《詩》。」¹⁰⁷以及「史主嚴而詩主寬，史體主敘述，詩主涵詠。」¹⁰⁸魏裔介顯然將《詩經》視為獨特的文學典籍，並且有意識地與其他經史著作區隔開來，儘管仍是側重經史對文學的影響，但畢竟正視了文學的獨立性。當然，在其所輯《溯洄集》卷首所附之《論詩》和《詩話》中，俯拾可見魏裔介對於具體詩藝的探討，這種行為則可視為他重視文學獨立價值的最好註腳。

當然，魏裔介對於文學獨立性的認識是有限度的，尤其體現於價值評估的層面。他曾經將文學家之文和理學家之文分別概括為「有意為文」與「無意為文」：

文亦難言矣，古今之為文者，奚啻數千百人，而傳於世者，固寥寥也。左丘明、司馬遷、班固、范曄以及陳、阮、潘、陸、任、沈、邢、魏，此皆有意為文者也。今世所尚者，惟此唐、宋八大家之文耳。八大家之中，昌黎能因文以見道，然亦未免有意為文也。若夫無意為文而文自工者，惟周、程、張、朱數子耳。周子之《太極》、程子之《易傳》、張子之《西銘》、朱子之奏議論序，皆不事鞏悅藻飾，而燦然犁然理至者，文自不可易也。¹⁰⁹

這番言論雖然梳理了文學史上的歷代古文大家，但在魏裔介的內心深處，依然視理學家的「無意為文」而自工為古文創作的最高境界。

（二）「性情正而天下真詩出」

在文學創作方面，魏裔介和其時的遺民文人以及學者文人均持「性情」論，¹¹⁰如魏裔介在《今詩溯洄集》自序中所言：「余於他書掩卷嗜臥，獨至於今之文人才士，其所為發抒性情、欲歌欲泣之什，不覺投枕而起，三致意焉。」¹¹¹概括言之，清初諸家所論之「性情」，大體可分為「性情之正」和「性情之真」兩大類，前者側重群體情感的抒發，要求恢復先秦兩漢的儒家傳教，後者則強調個體情感的表達，要求緣情而發。不

¹⁰⁶ [清]魏裔介：〈嶼舫近草序〉，同註2，頁143。

¹⁰⁷ [清]魏裔介輯：〈論詩二十則〉，同註31，卷首，頁5上。

¹⁰⁸ 同前註，〈詩話〉，頁15上。

¹⁰⁹ [清]魏裔介：〈孫鐘元先生歲寒居文集序〉，同註2，頁97。

¹¹⁰ 參見陳麗純：《明末清初的性情詩論研究——以陳子龍、錢謙益為代表》（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

¹¹¹ 同註20，頁105。

過，這兩類性情論在內涵上互有交集，並非水火不容，徑分彼此實為權宜之計。實際上，清初批評家多持兼顧互補之態度，如陳子龍（1608-1647）即立足於復古派之雅正而求真詩，錢謙益（1582-1664）即根植於公安派之真變而求雅正。¹¹²而魏裔介之「性情論」則在兼取二者基礎上，更偏向於帶有理學色彩的「性情之正」。但不管如何，追求「真詩」也是魏裔介的最終目標。

作為一位喜讀詩書的館閣大臣，魏裔介自然和清初眾多批評家一樣，不滿明末剽襲、空泛之文風，希冀復興儒家詩教之傳統。於是，魏裔介在為嚴沆（字子餐，號顥亭，1617-1678）、張文光（字譙明，1628 年進士）等好友詩集作序時，提出了藉「篤於性情」以「追美風雅」的主張：

以今觀譙明、顥亭、錦帆、尚白諸公，皆當世之篤於性情者也。擬議所構，追美風雅，卜子夏曰：「發乎情，止乎禮義，四始之歸，殆庶幾焉。」暇日以所彙梓近詩屬余序，余數從諸君子游，觀其引繩削墨，遣調馳情，莫不涵濡騷選，憲章盛唐，而北地、信陽、歷下、弇州之盛，殆掩映而過之。夫八音競奏，總為韶濩之聲；眾俎遞陳，並貴鼎實之味。以是鼓吹元音掃除綺麗可也。¹¹³

此類觀點看似與明代復古派性情論並無差異，實則不然。因為復古派性情論對於文學創作實踐的一個重要影響是「文必有法式」¹¹⁴和法先悟後之類的模擬學古主張，而這一點恰恰是魏裔介最為反對的。魏裔介評判「真詩」的首要標準是發抒性情，力求創新，如與梁清標論詩時稱：「詩之真者，原本性情，自出機杼，不屑屑捃摭剽竊為工；偽者反是。故性情正而天下真詩出。」¹¹⁵為嚴我斯（字就思，1629-？）詩作序時稱：「夫詩以言志，發抒性情，故作者代興，論述不一。要之協於三百之義，斯為正耳。昔元微之推尊杜子美，以為薄風雅而該沈、宋，奪蘇、李而吞曹、劉，掩顏、謝而雜徐、庾，盡得古今之體勢，兼昔人之所獨專。要之子美之詩，非取古人一一摹之，而包括無遺者，性情不詭於正也。」¹¹⁶

¹¹² 參見張健：《清代詩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 49-147。

¹¹³ [清]魏裔介：〈嚴顥亭張譙明諸子詩序〉，同註 2，頁 110。

¹¹⁴ 李夢陽〈答周子書〉曰：文必有法式，然後中諧音度，如方圓之於規矩，古人用之，非自作之，實天生之也。今人法式古人，非法式古人也，實物之自則也。」見郭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第 3 冊，頁 52。

¹¹⁵ 同註 46。

¹¹⁶ [清]魏裔介：〈嚴就思詩序〉，同註 2，頁 116。

與此同時，魏裔介也合理吸取了公安派重視「性情之真」的優長之處，認為只要「情真景真，句朗字響，即模擬亦佳，不模擬亦佳。」¹¹⁷可見，復古而不因襲、求真而歸風雅這個標準是魏裔介試圖調和「性情之正」與「性情之真」的一個策略。為此，他也將這個標準作為學習和創作詩文的最高境界，即所謂「為文之善」和「為詩之善」：「沉酣於左、國、班、馬，能出己之意而不襲其辭，為文之善者也；沉酣於漢、魏、三唐，能達己之情而不襲其句，為詩之善者也。」¹¹⁸當然，這一點也是魏裔介批駁明末空泛文風的關鍵：「優孟衣冠，萬耳一聵，歷下、竟陵，勃谿紛呶，誰能去組織雕績之習，洗摹擬煩碎之陋，以尊其性情於風雅者？」¹¹⁹

不過，魏裔介畢竟是一位理學大臣，他所謂的「性情之正」也時常流露出一定的理學色彩，「有真性命者有真文章，有真文章者有真經濟。」¹²⁰即將性情之正局限於一隅，具體而言，主題範疇為「道德性命之言，經濟康阜之志，獻納箴規之思，節義貞潔之懷，泌水笑傲之樂」；¹²¹藝術表現則拘泥於「言必歸於忠孝，意則趨於和平。」¹²²譬如為楊思聖之〈秋響〉組詩作序時，魏裔介就特別強調：「性情關乎君國，憂樂概夫人天；寓婉側於激昂，涵愍直於忠厚。」¹²³〈將歸草堂詩小引〉亦云：「髯淵至性過人，以忠孝自期許，於友誼尤篤，故其詩皆有為而發，絕去一切纖弱靡曼之習，使人興起感動。」¹²⁴不僅評價他人作品如此，魏裔介自身的創作也大體相當，閩南後學詹明章概括魏氏一生成就時云：

先生自幼至老，言論一本於經學，深得程、朱之精蘊。……及出而筮仕，自詞林以至卿相，皆有赫然可舉之事業。急流勇退，樂志林泉，優遊以終天年，則其出處顯晦動靜之際，又皆清明純潔，而無一毫之歉。故其發而為文章，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亦惟有本者故如是耳。¹²⁵

魏裔介崇尚杜詩的首要原因也在於此，「杜詩之所以高於百家者，以其忠君愛國之思勃

¹¹⁷ [清]魏裔介輯：〈詩話〉，同註31，卷首，頁17上。

¹¹⁸ [清]魏裔介：〈鄒黎眉湖北草堂詩序〉，同註2，頁117。

¹¹⁹ [清]魏裔介：〈申鳧盟詩序〉，同前註，頁116。

¹²⁰ [清]魏裔介：《靜怡齋約言錄》內篇，同註99，頁12上。

¹²¹ [清]魏裔介輯：〈論詩二十則〉，同註31，卷首，頁2上-2下。

¹²² 同註116，頁117。

¹²³ [清]魏裔介：〈且亭秋響序〉，同註2，頁120。

¹²⁴ [清]魏裔介：〈將歸草堂詩小引〉，見[清]田茂遇撰：《水西近詠》（順治十七年（1660）刻本），頁1上。

¹²⁵ 同註25，頁9。

勃溢於筆墨外也。」¹²⁶《兼濟堂文集》中有魏氏〈秋興〉組詩，顯係模仿杜甫詩而作。雖自知僅為「感慨時事而發」，作者仍舊擔心「恐未協風人之旨。」¹²⁷為文則崇尚「〈出師表〉、〈歸去來詞〉、〈原道論〉、〈太極圖說〉、〈東銘西銘〉、〈正氣歌〉，此六書者，三代而後之至文也。」¹²⁸顯然，魏裔介所言之「性情」體現於文學創作實是重視道學之性命而約束一己之情感，即使有個體的喜怒哀樂，也需「發皆中節，則可謂情得其正矣」。¹²⁹

總之，魏裔介之「性情」論，雜糅了儒家詩學政教精神的復興、明代後期復古派與公安派性情論的批判性繼承以及理學家濃厚的「重性約情」意識等諸多因子，由此遂使清初性情論主張更顯複雜和多元。

（三）「人心釀世運，世運變人心」

關於文學與時代的關係，《文心雕龍》〈時序〉篇有較為詳盡地闡說：「時運交移，質文代變」、「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而波震於下者」¹³⁰、「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¹³¹這裡主要說明歷代文學的轉變，皆著有其時代環境的色彩。此處所言之「世情」、「時運」、「與世推移」皆說明文學是社會的反映，朝代更迭、政治盛衰以及人情世俗、朝廷決策、帝王取向等都會影響當時的文學創作。至清初，著名文人錢謙益提出：「詩文之道，萌折於靈心，蟄啟於世運，而茁長於學問，三者相值，如燈之有炷、有油、有火而焰發焉。」¹³²其時大批的遺民文人更是如此，身處時代板盪之際，深切感受到時代變遷對文學產生的決定性影響。¹³³作為清初理學大臣，魏裔介對此也有精辟的概括，即「人心釀世運，世運變人心。」可見，時代對於文學的影響

¹²⁶ [清]魏裔介：《靜怡齋約言錄》外篇，同註103，頁12上。

¹²⁷ [清]魏裔介：〈與白青玉〉，同註2，頁263。

¹²⁸ [清]魏裔介：《靜怡齋約言錄》外篇，同註103，頁15下。

¹²⁹ 同前註，頁19上。

¹³⁰ [梁]劉勰著，黃叔琳註、李詳補註、楊明照校註拾遺：《增訂文心雕龍校註》（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539。

¹³¹ 同前註，頁542。

¹³² [清]錢謙益：〈題杜蒼略自評詩文〉，《有學集》，見[清]錢謙益著，錢曾箋註、錢仲聯標校：《錢牧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1594。

¹³³ 鄧漢儀〈詩觀初集序〉云：「當夫前朝末葉，銅馬縱橫，中原盡為荊榛，黎庶悉遭虔戮。於是乎神京不守，而廟社遂移。有志之士，為之哀板蕩、痛仇離焉。此其時之一變。繼而狂寇鼠竄於秦中，列鎮鴟張於淮甸，馴至甌閩黔蜀之間，兵戈罔靖，而烽燧時聞。此其時為再變。若乃乾坤肇造，版宇咸歸，使仕者得委蛇結綬於清時，而農人亦秉耒耕田，相與歌太平而詠勤苦。此其時又為一變。夫惟變之之極，故其人之心力才智，亦百出而未有窮。其歷乎興革理亂、安危順逆之交，中有所藏，類不能默然而已。以故憂生憫俗、感遇頌德之篇，雜然而作。一時公卿以訖韋布，其號為能詩，沈雄古麗，安雅柔淡，以幾於漢魏四唐之盛者，蓋指不勝屈。」參見[清]鄧漢儀輯：《詩觀初集》（康熙間慎墨堂刻本），頁1上-3上。

已經成為明末清初文人的共識。

對於魏裔介「世運說」意蘊的解讀可以從三個角度進行：其一是提出的背景。魏裔介「人心釀世運，世運變人心」的理論主張有兩個出處，第一次是在順治十三年前後。魏裔介輯選《觀始集》時曾作一首《選清詩觀始集作》詩：「人心釀世運，世運變人心。盛衰既遞轉，治亂亦相尋。群生天地間，激蕩成謳音。鴻纖既異致，雅俗判高深。聖主開文運，群賢慶盍簪。篇什多古風，聲價重球琳。寧敢繼絕筆，所願正哇淫。」¹³⁴第二次是在順治十八年末，魏裔介於《溯洄集》自序中再次提及：「自三百篇以後，詩凡幾變矣。衰於春秋戰國，盛於兩漢；衰於魏晉六朝，盛於唐；衰於五代宋，盛於明；衰於萬曆以後，盛於清之初。人心釀世運，世運變人心，良非偶然。變而不失其正，則有心世道者之責也。」¹³⁵可見，魏裔介「世運說」之提出皆源於編選清詩選本時所思所感，進而通過選本的流播來宣傳他的文學觀念。其中，對於明末文風的「正淫哇」和其時人心的「變而不失其正」則是魏裔介此論的言說背景。

其二是論證的過程。魏裔介「世運說」的理論關鍵在於探討世運、人心與文學作品三者之間的關係。其正向演進脈絡為，世運的盛衰影響人心的正變，而人心的正變進而可以影響文學作品的雅俗；其逆向演進脈絡為，文學作品的雅俗可以反映出人心的正變與否，而人心的正變同時也是考量世運盛衰的一個重要標誌。概而言之，即如魏氏所言：「文章隨氣運為高下，而氣運亦隨文章為轉移。」¹³⁶而魏裔介此番立論的最終意圖則是為即將到來的盛世文風尋找理論支撐。在具體論證此說時，魏裔介重點闡述了三條論據：一個是歷代文學盛衰遞嬗的客觀規律，《溯洄集》自序中已有申說，《觀始集》自序中亦有類似言論：「今天下言詩者，可謂眾哉。雖然，茲道甚大，未敢易言之也。自王風既息，騷賦迭興，盛於漢魏，而衰於六朝；盛於三唐，而衰於宋元。有明一代，盛於弘、正、嘉靖，而衰於隆、萬以後。文章隨氣運為高下，蓋非誣也。」¹³⁷此外如〈嚴顯亭張譙明諸子詩序〉中，魏裔介在梳理歷代文學發展情形之後亦感歎道：「夫其盛也，必有數君子乘時端化，倡明雅宗，以發抒天地精英澄湛之氣；而其衰也，遂曼聲雜進，人置一喙，狂瀾莫砥，世變繫焉。」¹³⁸顯然，這些都是魏裔介結合時代盛衰與文學發展而推理出的結論。

另一個是特定時期人心正變的可調控性。因為魏裔介所生活的年代處於明末清初，

¹³⁴ [清]魏裔介：〈選清詩觀始集作〉，參見[清]魏憲編：《百名家詩選》卷一，頁5上-5下。

¹³⁵ 同註111。

¹³⁶ [清]魏裔介：〈宮定庵窗藝序〉，同註2，頁205。

¹³⁷ [清]魏裔介：〈觀始集序〉，引自謝正光、余汝豐編：《清初人選清初詩彙考》（南京：南京大學，1999），頁26。

¹³⁸ 同註113。

大量明末遺民文人和清初入仕文人共存，他們的人心或曰「性情」各異，文風有別，故魏裔介倡議，只要經過積極有效地導引，不論是山林之人，還是廟廊之人，其文風皆可深得風人之旨，其《觀始集》和《溯洄集》便是魏裔介極力倡導的材料和手段。在選錄作品時，魏裔介並不回避山林之士，「凡策名通籍者，固多褒錄，其於山林之士，尤惓惓留意焉。」¹³⁹因為他既認為山林之人和廟廊之人皆可「出處不失其正」，¹⁴⁰同時又能主動正視二者性情的差異：「詩以道性情，而山林人之性情與廟廊人之性情，亦微有異。如孟浩然、孟東野、林和靖、魏仲先、謝四溟、徐文長，此山林人之性情也。而其詩高寄霞表，超然物外，無一點煙火氣，不作富貴紛華態，亦其自處者耳。」¹⁴¹是故，魏裔介在允許山林人之創作保持一定個性的同時，將之積極導引至廟廊人之群體文風。

¹⁴²

最後一個論據是當下文化環境的自由和諧與文壇自覺的糾偏意識。清初以降，雖曰海內未靖，時有亂事，但是總體而言，政治清明，稽古右文，「元元被潤澤而大豐美，聖天子方且金聲玉振，導揚宣洩，叶為歌詩，以繼咸英、韶護之盛。」¹⁴³與此同時，其時文壇亦認識到明代後期「歷下或失之板滯，竟陵或失之纖細」¹⁴⁴的弊端，皆欲匡救廓清之，繼而追逐先民，力崇正始。

其三是言說的目的。藉由上述三條論據，魏裔介必然會推理出如下結論，即不論從文學自身發展的規律來看，還是從當下世運、人心的實際情形來看，清初盛世文風的到來指日可待。魏氏所期待的盛世文風就是復歸風雅，具體而言，意即山林人和廟廊人皆可達至的「清真澹遠，不事鉛華，自然近於風雅」。¹⁴⁵可見，魏裔介之「世運說」業已成為他努力營造盛世文風的一個理論依據，換言之即「風雅之道，關乎人之性情，亦時運所由徵其盛衰也」。¹⁴⁶

（四）「積學、深情、大雅」

魏裔介〈宋牧仲詩序〉曰：「海內作者，比肩林立，而名家者鮮，何也？非積學不

¹³⁹ [清]魏裔介：〈陸何異灌餘集序〉，同註2，頁137。

¹⁴⁰ [清]魏裔介：〈張湛虛先生雲隱堂文集序〉，同前註，頁96。

¹⁴¹ [清]魏裔介：〈渡江小詠序〉，同前註，頁134。

¹⁴² 魏裔介〈今詩溯洄集序〉云：「數年以來，復有仕籍縉紳先生，及菰蘆中布衣賢士所作，發抒性情，欲歌欲泣之什，或得之投贈，或得之選刻，每有所見，不敢荒忽，必擇其雅馴而意指雋永者，令胥吏錄之赫蹏。」見《兼濟堂文集》，同前註，頁106。

¹⁴³ [清]魏裔介：〈刪後詩序〉，同前註，頁134。

¹⁴⁴ [清]魏裔介：〈薛雨堂唐詩選序〉，同前註，頁103。

¹⁴⁵ [清]魏裔介：〈吳星若詩草序〉，同前註，頁138。

¹⁴⁶ 同註113。

能作，非深情不能作，非大雅不能作。其弊亦非一端，曰靡，曰放，曰僻，曰泛，曰蕩，曰俗，曰艷，曰腐，曰湊，曰漫，是數者於詩之義蘊皆無取焉。」¹⁴⁷魏氏歷數了時人文風之諸種弊端，且明確提出了詩文名家必備的三要素，即積學、深情和大雅。顯然，這裡涉及到魏裔介對於創作主體素質的考量以及對於創作風格的評價，下面分而論之：

首先，魏裔介對於創作主體的要求首重性情、人品，次為才情、學問。由於其「性情論」前文已有闡發，不再贅述，故重點解讀魏裔介對於才學的看法。在《兼濟堂文集》和《溯洄集·詩論》中，魏裔介多次提及才情、學養對於詩文創作的重要性：

非多讀書，則其識不高而懷不曠，識不高懷不廣，縱嘔盡滿腔血，終是酸餒氣耳。¹⁴⁸後世善為詩者，晉有陶淵明，唐有杜子美，宋有蘇子瞻，明有李空同。其他作者林立，要不與之方駕齊驅。雖其學力之深厚哉，亦由其得於天者有獨至也。¹⁴⁹漢、魏質樸近古，唐人以詩取士，若李、杜、王、孟、沈、宋、高、岑諸公，風騷颯起，膾炙人口。皆以不羈之才，終身揣摩，故遺響流徽，陶鑄千載。¹⁵⁰不讀盡古人書，不可以詩；讀盡古人書，亦不可以詩。蓋讀書者學也，十年面壁者思也。學之功三，思之功七。¹⁵¹

魏裔介甚至認為，當遺民文人之性情與入仕文臣之性情有所差異時，也能以才學相劑，達至風雅。¹⁵²不過，他也注意到，才情和學問不是僅靠天賦和讀書而得，還要做到反思揣摩，舉一反三。在具體進行文學創作時，還應該將才學有機地內化於藝術構思之中，而不為外在的才學所累，即如魏氏所言：「詩不可無才情，然才情，詩之忌也；不可無學問，然學問，詩之忌也；不可無議論，然議論，詩之忌也。精驚心遊，一氣抒瀉，才情、學問、議論安所用之？」¹⁵³當然，「文章非有才學者不能作，非有品行者不足貴。」¹⁵⁴創作主體的人品也是魏裔介考量的一個重要指標。

另外，魏裔介還推薦了一個對於文學創作而言非常實用的積學途徑，即遊學。「文

¹⁴⁷ [清]魏裔介：〈宋牧仲詩序〉，同註2，頁112-113。

¹⁴⁸ [清]魏裔介：〈朱公艾越游草序〉，同前註，頁136。

¹⁴⁹ [清]魏裔介：〈楊猶龍續刻詩集序〉，同前註，頁114。

¹⁵⁰ [清]魏裔介：〈披雲居偶吟初集序〉，同前註，頁144。

¹⁵¹ [清]魏裔介輯：〈論詩二十則〉，同註31，卷首，頁4下-5上。

¹⁵² 魏裔介對於申涵光詩的評價即是如此，「今鳧盟之性情與人遠矣，而其才與學，又足以濟之，高風遠韻，寄心霞末。」見《兼濟堂文集》，同註2，頁116。

¹⁵³ [清]魏裔介輯：〈論詩二十則〉，同註31，卷首，頁4下。

¹⁵⁴ [清]魏裔介：《靜怡齋約言錄》外篇，同註103，頁19下-20上。

不遊，不能奇，詩不遊，亦不能奇。何者？人雖有思有懷，亦必以山水之氣突兀激蕩之，而後筆墨間具風雨爭飛，雲霞倏變之態。不然，坐守穹廬中，雖取兩漢、六朝、三唐詩，咿唔摹擬，終是優孟衣冠，全無生動處。」¹⁵⁵並且列舉了吳學炯（字星若）的遊學實例，「吳子將度滹沱，歷上谷，登燕臺，過薊丘，尋碣石之舊宮，吊漸離之遺跡，與賢士大夫倡予和女，拈鬪分韻，賡揚國家典章制作之休美，為揚雄、班固之賦，為馬遷、韓愈之文。」¹⁵⁶可見，魏裔介非常重視「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相結合的積學策略。

其次，魏裔介在指摘當下文風弊端的同時，更加注重對其時文風臻於大雅的積極引導，可謂有駁有立。他提到的十點弊病雖就詩歌而言，實際上其他文學樣式同樣適用，歸結起來就是，不可人云亦云，不可泛泛而談，不可乖僻淫邪，不可粗俗不堪，不可空疏不學，不可濫竽充數，不可沒有節制。反之，只有做到自辟蹊徑、言之有物、清雅和平，才可視為「大雅」之文風。魏裔介認為，只有通過廣泛性學古和選擇性融今兩種策略，此宏偉目標才有可能實現。

魏連科評價魏裔介「文宗韓愈，詩宗陶、韋」，¹⁵⁷其實，魏裔介取徑範圍甚廣，遠不止此。就古文而言，「文章自六經、語、孟而外，當首推左丘明、屈原、司馬遷、班固為嫡派，而韓文公起衰八代，歐、曾、三蘇繼之，茅鹿門先生遂有八大家之選。自是海內操觚之士，咸知所崇尚焉。」¹⁵⁸就詩歌而言，自三百篇始，以迄明代李夢陽（1472-1530），其間詩歌名家幾乎囊括殆盡。這種轉益多師、廣泛學古的做法可以最大限度地博采眾家之長，以期改變當下文壇流蕩忘返的綺靡淫佻之習。不過，在具體師法對象的學習方面，魏裔介復著有一定的理學色彩，如「學少陵者，學其氣之混茫，辭之雄博，非學其痛苦流涕也；學淵明者，學其自靖之志，寄託之苦，非學其耕田飲酒也。」¹⁵⁹

另外，清初文壇不論派別、身份，皆不滿於明末文風，主張復古，倡導溫柔敦厚之文風。只是，諸家復古的途徑以及對於「溫柔敦厚」的理解卻有所差異。學者型文人黃宗羲即用《詩經》中「變風變雅」來說明發憤怒罵也是「溫柔敦厚」之表現，¹⁶⁰河朔詩

¹⁵⁵ [清]魏裔介：〈堵乾三詩草序〉，同註2，頁132。

¹⁵⁶ 同註145。

¹⁵⁷ [清]魏裔介著，魏連科點校：〈前言〉，同註2，頁14。

¹⁵⁸ [清]魏裔介：〈金息齋先生文集序〉，同註2，頁98。

¹⁵⁹ [清]魏裔介輯：〈論詩二十則〉，同註31，卷首，頁3上-3下。

¹⁶⁰ 黃宗羲〈萬貞一詩序〉曰：「彼以為溫柔敦厚之詩教，必委蛇頽墮，有懷而不吐，將相趨於厭厭無氣而後已。若是，則四時之發斂寒暑，必發斂乃為溫柔敦厚，寒暑則非矣；人之喜怒哀樂，必喜樂乃為溫柔敦厚，怒哀則非矣。其人之為詩者，亦必閑散放蕩，巖居川觀，無所事事而後可；亦必茗碗薰爐，法書名畫，位置雅潔，入其室者，蕭然如睹雲林海嶽之風而後可。然吾觀夫子所刪，非無〈考槃〉、〈丘中〉之什厝於其間，而諷之令人低徊而不能去者，必於變風變雅歸焉。蓋其疾惡思古，指事陳情，不異熏風之南來，履冰之中骨，怒則掣電流虹，哀則淒楚蘊結，激揚以抵和平，方

派遣民詩人申涵光，則是從取法杜甫的角度闡述發憤之作也屬性情之正，如其〈嶼舫詩序〉云：

古詩類尚和平。吾見古之能詩者，率沈毅多大節，即如杜陵一生褊性畏人，剛腸疾惡，芒刺在眼，除不能待，其人頗近嚴冷，與和平不類也。而古今言詩者宗之。惡惡得其正，性情不失，和平之音出矣。繞指之柔與俗相上下，其為詩必靡靡者，非真和平也。嚴冷如先生（筆者按：指魏裔介），吾固知詩之有是也。蒼涼渾博，骨韻似少陵，而索之無跡。¹⁶¹

頗有意味的是，申涵光此論恰是針對詩友魏裔介詩而發。二人同尚杜甫，魏裔介學其「忠君愛國」之思以及「蒼涼渾博」之氣，而申涵光卻從中發掘出「溫柔敦厚」之別解。實際上，魏裔介對於「溫柔敦厚」的理解主要側重於怨而不怒、和平雅正，但是對於「變風變雅」之作也沒有一概否定。如在評價江左俊士堵乾三之詩時，對其磊落激蕩之真性情也頗為讚賞：「凡古之豪傑既沒而不可作者，皆悲歌憑弔，感慨徘徊不能去。而其崢嶸磊落骯髒不平之氣，一一發洩之於詩。」¹⁶²

不過，魏裔介時常在稱讚文友「變風變雅」之作的同時，不自覺地會尋覓出這些文人作品中合乎「溫柔敦厚」標準的文風。如提及南州丁弘誨（字景呂）之詩，魏裔介也默許了其久困公車期間的憤激之作：「凡歷覽山川，投分蘭茝，寒暑之變態，風雨之晦明，一切可喜可愕可悲可啼之狀，足以發其幽思，抒其逸致者，無不寓之於詩，而其詩遂自足千古。」待至丁氏綰綬鹿泉時，魏裔介評其詩風則易為：「風期適上，意氣溢涌，藻思綺合，古致流雲。」¹⁶³總之，有選擇性的融今策略使得魏裔介用較為包容的心態去觀照清初文壇，易於結識不同群體、地域和流派的文人，也為盛世文風的最終確立奠定了基礎。

此外，魏裔介在長期的文學閱讀和創作實踐過程中，也積累了一些文學創作與鑒賞的經驗，對於文學本質的理解也逐步深入，尤其體現在詩歌領域。諸如在創作方面，魏裔介雖然主張「積學」、「深情」，但並不排斥嚴羽「詩有妙悟」、「詩有別才別解」

可謂之溫柔敦厚也。」參見〔清〕黃宗義著，沈善洪主編：《黃宗義全集（十）——南雷詩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頁90。

¹⁶¹ 〔清〕申涵光：〈嶼舫詩序〉，同註56，頁3下-4上。

¹⁶² 同註155。

¹⁶³ 同註143，頁133。

等文學觀點，¹⁶⁴反而將「悟」視為「作詩之活法」，¹⁶⁵非常重視「悟」的作用：

詩以悟為主。東坡跋李端叔詩卷：「暫借好詩消永夜，每逢佳處即參禪」，嚴氏曰：「漢、魏尚矣，不假悟也，康樂以至盛唐，透徹之悟也。」此猶從詩言也；若論至人，胸如日月，作詩文自然透徹。魯直云：「參禪而知無功之功，學道而知至道不煩。」故詩文能造微入妙。此直須悟徹始得，豈可為單見寡聞者道哉？¹⁶⁶

嚴羽曾云：「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¹⁶⁷此處魏裔介即借用嚴羽、黃庭堅（1045-1105）「以禪喻詩」之法，來論證作詩文時「悟」之重要性。一般而言，尊崇程、朱理學者重修，尊崇陸、王心學者重悟，魏裔介兼而有之，故而這亦可視為魏裔介自覺折衷兩派學說在文學領域的實踐。

閱讀方面，魏裔介繼承了孟子（372-289B.C.）「知人論世」的主張，提出「貴達作者心，洵可為讀書法」。¹⁶⁸此外諸如「詩有力量」、「詩拗則句健」、「作詩閱詩之法，要下剪裁手段」等言論皆為其創作和鑒賞之心得，¹⁶⁹頗具參考價值。

四、結語

結合魏裔介的文學活動和文學思想，我們可以將其在清初文壇的地位和影響大致定位如下：其一，魏裔介以佐治心態提倡復古，成為其時批駁明末靡弱文風的積極力量，故魏裔介的文學創作同時也體現了明末清初文風的轉變歷程。楊思聖為魏氏詩集作序時對此評價甚高：「今日之詩弊極矣，若乃性情真摯，語關風雅，則振衰起弊，不得不惟吾友為中原獨步也。」¹⁷⁰不過，與遺民文人復古不同，魏裔介倡導風雅的心態是為迎

¹⁶⁴ 魏裔介〈鮑讓侯詩集序〉云：「嚴滄浪云：『詩有妙悟，非關理也。』若讓侯者，其從悟後而得之乎！悟者之於詩，譬如畫龍點睛，其餘鱗甲，都無用處。」頁131〈喬文衣詩序〉云：「喬子十餘年來，詩道日進，聲譽藉藉，公卿間爭折節交之恐後。喬子何以遂能詣至此哉？吾聞詩有別才別解，不盡關於學與理，大端在能悟耳。」分別見於〔清〕魏裔介：《兼濟堂文集》，同註2，頁131、152。

¹⁶⁵ 〔清〕魏裔介輯：〈詩話〉，同註31，卷首，頁13上。

¹⁶⁶ 同前註，頁12上-12下。

¹⁶⁷ 〔宋〕嚴羽著，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頁12。

¹⁶⁸ 〔清〕魏裔介輯：〈詩話〉，同註31，卷首，頁14下。

¹⁶⁹ 同前註，頁16上、14上、16上。

¹⁷⁰ 〔清〕楊思聖：〈嶼舫詩集序〉，見〔清〕田茂遇輯：《燕臺文選初集》，卷三，頁26下-27上。

合其時的政治局面和右文政策。其二，魏裔介通過自身的文學實踐和文學思想，向文壇傳達了希冀樹立盛世文風典範的信息。譬如編刻《觀始集》與《溯洄集》這種選詩實踐，以及論詩主張才、格、調、思皆「清」等觀點，¹⁷¹即為引領當代詩風、營造盛世詩風的實施策略。¹⁷²此外，魏裔介還充分利用自身的政治身份和包容心態，自由穿行於清初諸階層文人群體之中，自然會對其時的文壇發揮重要的影響作用。總之，魏裔介的文學活動與主張理應成為清初文學創作與批評領域的一個有機組成部份。

¹⁷¹ 魏裔介《溯洄集》卷首云：「陶、謝、韋、柳為正風，何也？以其才清也。格不清則凡，調不清則冗，思不清則俗。王、楊之流麗，沈、宋之豐蔚，高、岑之悲壯，李、杜之雄大，其才不一，而格、調、思未有不清者也。」參見〔清〕魏裔介：《詩話》，同註31，卷首，頁10下。

¹⁷² 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稱其《觀始》與《溯洄》二集之刊刻，志在「競名」，謝正光、余汝豐編《清初人選清初詩彙考》也附和此說，實則謬矣。（分別參見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卷五，頁620；謝正光、余汝豐編：《清初人選清初詩彙考》，頁31。）考魏裔介刊刻《觀始集》、《溯洄集》時，魏裔介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正值仕途上春風得意之時，尚無必要以此競名。另，《魏貞庵先生年譜》「丙申，公四十一歲」條，除了記載選輯《觀始集》之事，尚有相鄰的一條記載值得注意：「時上御製之書，有《戒殺彙鈔》、《人臣儆心錄》、《資政要覽》、《順治大訓》、《勸善要言》、《範行恒言》、《孝經衍義》等書，公上疏請頒賜天下，以善世化俗。」（參見〔清〕魏荔彤輯：《魏貞庵先生年譜》，同註12，頁18下。）其實，魏裔介刊刻兩部詩選除卻附庸風雅之外，主要目的是在文學領域「善世化俗」，倡導盛世詩風。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梁〕劉勰著，黃叔琳註、李詳補註、楊明照校註拾遺：《增訂文心雕龍校註》，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 〔宋〕朱熹著：《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宋〕嚴羽著，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第2版。
- 〔清〕田茂遇輯：《燕臺文選初集》，順治十三年（1656）刻本。
- ：《水西近詠》，順治十七年（1660）刻本。
- 〔清〕申涵光：《聰山文集》，康熙二年（1663）《聰山集》叢書本。
- 〔清〕魏憲輯：《詩持一集》，康熙十年（1671）枕江堂刻本。
- 〔清〕鄧漢儀輯：《詩觀初集》，康熙間慎墨堂刻本。
- ：《詩觀二集》，康熙間慎墨堂刻本。
- 〔清〕魏憲編：《百名家詩選》，康熙二十一年（1682）枕江堂刻本。
- 〔清〕孫鉉輯評：《皇清詩選》，康熙二十七年（1688）刻本。
- 〔清〕魏裔介：《靜怡齋約言錄》，清刻本。
- 輯：《溯洄集》，康熙元年（1662）刻本。
- 著、魏連科點校：《兼濟堂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清〕錢謙益著，錢曾箋註、錢仲聯標校：《錢牧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 〔清〕吳偉業著，李學穎標校：《吳梅村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 〔清〕黃宗羲著，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
- 〔清〕徐鉉：《本事詩》，光緒十四年（1888）邵武徐氏刊本。
- 〔清〕魏荔彤輯：《魏貞庵先生年譜》，光緒五年（1879）定州王氏謙德堂刻本。
- 〔清〕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
- 〔清〕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 〔清〕徐世昌輯：《晚晴簃詩匯》，民國十八年（1929）退耕堂刻本。
- ：《大清畿輔先哲傳》，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年。

二、近人論著

- 王秀彥：〈清初名臣魏裔介〉，《邢臺師範高專學報》2000年第1期。
- 王政堯：〈論清代名臣魏裔介〉，《故宮博物院院刊》1990年第4期。
- 王雲五：〈魏裔介的政治思想〉，《清代政治思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年。
- 王勝軍：〈論魏裔介的復性之學〉，《貴州社會科學》2009年第7期。
- 李建麗等：〈魏裔介及其家族墓志綜考〉，《文物春秋》1996年第4期。
- 林鐵鈞、史松主編：《清史編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
- 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第四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 高進：〈《清史列傳·魏裔介》辨誤四則〉，《歷史檔案》2011年第1期。
- 陳友琴編：《元明清詩一百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 陳永明：〈降清名臣與清初輿論〉，《漢學研究》第27卷第4期，2009年。
- 馮其庸、葉君遠：《吳梅村年譜》增訂本，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7年。
- 張健：《清代詩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 郭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 陳潔儀：《魏裔介：明末士人仕清個案研究》，香港：香港大學碩士論文，2005年。
- 張壇茹：〈清初名臣魏裔介的為詩之道〉，《青年文學家》，2010年第1期。
- ：《魏裔介散文研究》，保定：河北大學碩士論文，2010年。
- 陳麗純：《明末清初的性情詩論研究——以陳子龍、錢謙益為代表》，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年。
- 黃一農：〈魏裔介與天主教〉，《兩頭蛇：明末清初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 黃色芬：《華北仕清漢官與明遺民的出處》，臺北：國立師範大學碩士論文，1997年。
- 楊菁：〈心統與治統的建構〉，《清初理學思想研究》，臺北：里仁書局，2008年。
- 葉慶炳、吳宏一編：《清代文學批評資料彙編》上冊，（中國文學批評資料彙編之八），臺北：成文出版社，1979年。
- 齊仁達：《魏裔介生平與著作研究》，上海：復旦大學碩士論文，2010年。
- 劉水雲：〈魏裔介〉，《溫州師範學院學報》，2003年第6期。
- ：〈明清戲曲家新考——魏裔介〉，《溫州師範學院學報》2003年第6期。
- 潘志鋒：〈魏裔介的道統論〉，《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3期。
- 謝正光、余汝豐編：《清初人選清初詩彙考》，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Fang Chao-ying, "Wei I-chieh," in Arthur W. Hummel (1884-1975) (ed.),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44.

Lynn A. Stuve, "Ruling from the Sedan Chair: Wei Yijie (1616-1686) and the Examination Reform of the 'Oboi' Regency," *Late Imperial China*, Vol. 25, No. 2 (December 2004).

On Literary Activities and Thought of Wei Yi-jie

Wang Bing^{*}

Abstract

Wei Yi-jie (1616-1686) was a well-known Neo-Confucianist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His literary activities and thought have long been ignored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As a matter of fact, he was not only a diligent writer, contributing a great deal in editing and inscribing literary collections, but also chanted and composed verses adopting the same rhymes and sequence with scholars of different kinds. Expressing personal feelings truthfully, he composed poems and prose with an elegant style. He stressed the autonomy of literature on the basis of “Wen subjecting to Tao”. He introduced the notion of “true poem” based on the value “true temperament”. In addition, he had some deep thinking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literature and the era, between literary quality and the disposition of the writer. He also articulated his views on poetry appreciation. Giving the consideration to his prominent social status and his influence to the literary circles of his time, this study states that Wei Yi-jie’s literary achievement both reflec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literary style of the end of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y, and set a model style for a grand age.

Keywords: Wei Yi-jie, literary activities, literary thought, disposition, early Qing Dynasty

^{*} Assistant Professor,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